



## 【论 文】

#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现状与发展前景<sup>1</sup>

菅志翔、马戎

中国有 55 个由政府正式认定的少数民族群体，其中 18 个民族的人口超过 100 万，5 个超过 1000 万，同时另有 6 个民族的人口低于 1 万人，人口规模差异悬殊。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发展程度存在极大差异，其中有独立语言文字和系统历史文献的民族有满、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柯尔克孜等。绝大多数民族没有发展出独立文字，甚至一些群体的大多数人口已转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如满族、土家族、畲族转用汉语）。我们必须认识到，各民族的语言和文献都是其历史文化的结晶和载体，凝聚并承载着该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我们讨论少数民族教育时，各族语言文字与传统文化如何通过国家主导的制度性教育体系得到传承与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专题。

对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大多偏重两部分内容：一是对政府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制度与政策进行文件梳理和讨论，分析政策导向和制度政策演变进程；二是通过政府公布的教育统计数据 and 语言调查资料（包括通过母语接受各级学校教育的学生规模和母语使用人口规模变化），分析各民族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谢启昆，1989；陈红涛，1990；阿尔宾达賚、沙马·甲加，1996；何俊芳，1998；韩达，1998；王锡宏，1998；戴庆厦等，1999；滕星，2001；哈经雄、滕星，2001；滕星、王军，2002；潘启富，2006；吴明海，2006；司永成，2011；崔珂琰，2017；等）。这些研究成果都是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勾勒出中国少数民族母语使用与学习的基本态势，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相关政策的演变进程。

与此同时，还有三个因素不可忽视：（1）任何一种语言教育制度和相关政策都非凭空产生，而是历史进程中原有制度的某种延续。因此，必须梳理中国历史上实施的语言政策与教育制度；（2）教育制度和语言政策体现了政府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趋势的政策性引导，是国家语言文化政策和发展前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3）在国际交往中，国家语言教育制度政策难免受到境外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由于教育制度（包括教学语言选择）是政府语言政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国家的政体或主导族群的变化有可能导致语言政策的调整，发生国界变更和人口重组的新建国家也将根据境内族群人口结构来调整语言政策。

鸦片战争后，中国经历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历史时期。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包括国民教育）深受欧美国家影响，甚至曾有汉字拉丁化的倡议<sup>2</sup>。1949 年建立的新中国在许多领域曾深受苏联影响。因此，我们研究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教育时，需要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中国的语言教育制度与社会实践进行回溯，同时需要关注其他国家语言教育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借助历史延续和境外影响这两个参考系，将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前中国的少数民族教育现状及发展前景。

## 一、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语言使用与语言教育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历史中，中华大地上先后生活着许多拥有自己语言的族群。在社会、

<sup>1</sup> 本文刊载于《二十一世纪》2024 年 4 月号，第 4-20 页。该刊发表时有删节。

<sup>2</sup> 1920 年代赵元任提出国语改用罗马字母，1930 年代瞿秋白提出拉丁化新文字，钱玄同主张直接借用世界语。  
[https://www.sohu.com/a/153515105\\_276265](https://www.sohu.com/a/153515105_276265)（2023-10-12）

经济与文化交往中，各族之间相互学习语言是普遍现象。随着政权更迭和族群融合，一些语言成为族际交流的主要工具，另一些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语言文字（如西夏文）则退出历史舞台。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过程中，“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费孝通，1989：5）。秦统一中原后，汉语文成为中华民族核心区域的通用语言文字。“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上层分子通晓汉语文，下层兼通汉语。与汉族长期相邻的少数民族，往往很早就使用本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特别是其上层分子兼通两种语言的现象更为普遍。不同民族之间，由于语言不同，相互交际时往往则‘各以汉语为证，方能辩之’”（何俊芳，1998：29）。根植于中原地区众多的人口、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基础，汉文的使用历史悠久，留下丰富的历史文献和文学瑰宝。清朝前期曾力推满文，但是由于使用汉文的人口众多和应用广泛，满人逐渐转用汉语文。康熙年间编撰的《康熙字典》起到进一步规范汉语文的作用。许多朝代曾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汉语、母语学习的双语教育，如清朝自乾隆、嘉靖年间开始在新疆推行“双语双轨制”。在官办义塾和蒙养学堂“由汉族教习用汉语文教维吾尔族儿童少年，……宗教界办的经文学校……学阿拉伯文，也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宗教知识的教育”（韩达，1998a：229）。整体而言，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往往是汉语文与少数民族语言同时使用流行。中原地区形成的大量汉文经书、史书、法典及其他文献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是各民族共同学习、传承的精神财富”（史金波，2024：100）。

辛亥革命后，历届民国政府十分重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1912年3月民国政府设立教育部，下设蒙藏教育司，1913年公布《蒙藏学校章程》。1929年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蒙藏之决议案”，对边疆学校设置、经费划拨、学生优待等作出具体规定。193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推进边疆教育方案》。1941年颁布《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方案》（马廷中，2007）。1940年，由教育部辅助设立的边疆小学已有2375所（潘启富，2006：117）。民国政府的上述举措对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推进作用，涉及主要地域是少数民族人口集中并在行政区划上有特殊设置的内蒙古、青海、西康和新疆地区。

在民国时期的新疆，除传统汉文启蒙教材外还编印“民汉合璧”识字课本。少数民族精英开办的学校（如阿图什依沙克学校）开设维语文、汉语文、外语（阿拉伯语、俄语）及算术、地理等课程。1931年发布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第六章“蒙藏教育”在“实施纲要”的“课程”部分提出“小学校之教科图书，用蒙汉文、藏汉文合编之；中等以上学校之教科书，以用汉文编订为原则”。“1936年新疆省教育厅下令民族学校开设汉语课，汉族学校开设维语课，均从小学五年级开始”（韩达，1998a：245、257）。由此可见，汉语和少数民族母语并行的双语教育，是民国时期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学校语言教育的基本模式。对于“蒙藏教育”明确提出“应特别注意下列各点：a. 中华民族之融合的历史。b. 边疆和内地之地理的关系。c. 帝国主义侵略蒙藏之历史及事实。d. 蒙藏人民和国民革命的关系。e. 蒙藏人民地方自治和民权主义的关系。f. 蒙藏人民经济事业和民生主义的关系。g. 其他有关蒙藏人民特殊环境之教材”（韩达，1998b：85）。

在学校教育中，国民政府非常重视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加强有关“中华民族融合历史”、“帝国主义侵略蒙藏历史”的教育。“蒙藏人民和国民革命的关系”实际上讲的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强调蒙藏人民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唤起民族精神，以破除部落思想”，共同推动“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即国族主义<sup>1</sup>。“地方自治”体现的是各少数民族的“民权”。“经济事业”则事关少数民族的“民生”。其总体目标是“依遵中山先生民族平等之原则，由教育力量，力图蒙藏人民语言意志统一，以期五族共和的大民族主义国家之完成”（韩达，1998b：85）。

---

<sup>1</sup> “甚么是民族主义呢？按中国历史上社会诸情形讲，我可以用一句简单话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孙中山，1924：2）。

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及少数民族教育理念有几点值得关注：（1）继承孙中山“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政治纲领；（2）1929年国民党三大提出在蒙古、西藏和新疆实行三民主义，“由此开始，南京国民政府以《五权宪法》和《地方自治实行法》代替《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不再承认蒙古、藏、回等民族之自决权，而转向民族自治的主张”（崔珂琰，2017：90-91）；（3）在政府文告和教科书中极力淡化“民族”议题和“少数民族”概念。1938年《国民政府渝字第470号训令》提出：“对于边疆同胞之称谓似应以地域为区分，如内地人所称某某省县人等，如此则原籍蒙古地方者可称为蒙古人，原籍西藏者，可称为西藏人，其他杂居于各省边僻地方文化差异之同胞，似亦不妨……称为某某省边地或边县人民，以尽量减少分化民族之称谓”（引自崔珂琰，2017：92）。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知识界与广大民众热切期望能以“中华民族”为边界，团结全国各族民众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1939年，顾颉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建议此后不再把满蒙回藏等群体称为“民族”，主张把全体中国人的“民族”概念定位于“中华民族”（顾颉刚，1939）。这一观点也体现在当时民国政府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文件中。团结一致、救亡图存是当时全国各族民众的共同心愿，民族认同意识和少数民族教育也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前提下得以推进。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少数民族教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 1. “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

新中国建立初期，许多领域深受苏联体制的影响。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纲领性文章中明确提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毛泽东，1946：1481）。他提出新中国必须坚持“一边倒”的政策。“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1946：1473）。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雅尔塔体系及冷战导致世界上形成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这种新格局下，“一边倒”方针是当时国际关系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丁明·2003）。新中国成立后曾出现学习苏联的高潮，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指导各部门、各企业的工作，大批中国留学生前往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一边倒”政策实际上把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联系起来。苏联专家指导中国政府制定“一五”计划，苏联模式也成为中国社会各领域各部门效仿的榜样。一些学者认为新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划带有明显的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特点（孔寒冰，2001）。

“一边倒”政策使新中国不仅在国际关系和工业发展等方面倚重苏联，同时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体制等许多方面也努力学习苏联的制度与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当时的一些做法产生了不少弊端，走了一些弯路（游艳丽，2004）。

在民族理论和相关制度政策建设方面，新中国把苏联作为实现民族平等和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成功榜样。苏联建国后即在国民中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并以此作为组建联邦制和推行各项民族制度政策的人口基础（潘志平，1999）。一些西方学者指出，正是由于“民族识别”和民族共和国的组建“导致‘族群性’的强化而不是消亡。这种预期对于那些（人口）较大的民族而言已经得到了证明：苏联并没有成为‘民族熔炉’，而是成为‘新民族’的孵化器”。（Suny, 1993: 87）在一定程度上，新中国没有继承民国时期“国族构建”的基本思路，而是借鉴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苏联制度，一方面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共同纲领》《宪法》），另一方面1949-1987年期间的中央重要文件曾长期缺失“中华民族”概念，直至2018年“中华民族”才首

次写入宪法修正案（菅志翔、马戎，2022）。

1955-1956年中共中央派出民族识别调查组前往各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识别调查工作。50年代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是在斯大林“民族”定义和相关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在这一过程中，苏联专家曾实质性参与中国民族识别工作（黄光学，1995：112；马学良，2009：358；卢露，2016：146）。据费孝通先生回忆：“在开始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我们曾反复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特别着重学习了**斯大林著名的有关民族的定义**……这是对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西方民族的科学总结，应当作为我们进行**民族识别的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费孝通，1978：300）。考虑到中国各民族聚居区的演变历史与发展态势，新中国没有采用联邦制，而是采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先后识别出55个少数民族，为各民族分别建立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20个自治县（旗），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受教育对象的人口边界和行政管理地域。

1949年的《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195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提出：“各民族自治机关得采取必要的和适当的办法，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艺术和卫生事业。……教育各民族人民互相尊重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6条要求“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语言和招生办法**”。第37条要求“民族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民族教育，扫除文盲，举办各类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举办民族师范学校、民族中等专业学校、民族职业学校和民族学院，培养各少数民族专业人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以为少数民族牧区和经济困难、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山区，设立以寄宿为主和助学金为主的公办小学和民族中学。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以少数民族语言讲课；小学高年级或者中学设汉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秘书组、国家民委政法司，2002：59，90，72-73）。作为国家基本法律的上述文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分析建国后少数民族教育演变进程，也是我们认识近几年一些地区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过程中出现波折的重要线索。

与此同时，1949-1987年期间中央政府重要文件话语使用有几点值得关注：（1）把国内满、蒙、回、藏等各群体称为“民族”，把中国表述为一个“多民族国家”；（2）不再提及“中华民族”概念（代国歌除外）（菅志翔、马戎，2022）；（3）不再使用1949年前国内报刊书籍和政府文件中常用的“国族”“国民”“国文”（如小学课本的《国文》改为《语文》）等提法。这些纲领性文件中相关用词的上述变化，标志着新中国的民族理论和相关话语已经把“民族”这个最重要核心概念的应用，明确定位在汉、满、蒙、回、藏等国内群体的层面，且主要指涉少数民族（如“民族事务”“民族政策”“民族工作”等主要指涉中国的少数民族群体，与汉族无关）。

## 2. 中国各族语言文字在社会交流中的实际应用情况

为了全面理解和分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应用态势，并以此作为事实基础来思考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我们需要调查分析中国各族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应用状况。中央政府设计各少数民族的学校语言教育政策的基础，应当是对各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的社会调查。

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动乱，自民国时期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国缺乏对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的全国性调查。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加拿大拉瓦尔大学联合开展的全国性语言使用调查结果，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各民族的语言使用情况<sup>1</sup>。这次调查涵盖了中国52个少数民族（表

<sup>1</sup>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一书对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是否用于新闻媒介、是否用于双语教育）提供了数据并有具体分析（戴庆厦等，1999：201-203）。

1) (何俊芳, 1998: 92-93), 没有涵盖的 3 个群体是回族、俄罗斯族和塔塔尔族。由于回族自明清以来已通用汉语, 1990 年普查时俄罗斯族和塔塔尔族人口规模较小 (人口分别为 13500 人和 5064 人) 而且很大比例为族际通婚及其后裔<sup>1</sup>, 大多数人已转用当地通用语言 (汉语、维吾尔语)。上述情况可能是此次语言调查没有涵盖这 3 个民族的原因。

表 1、1980 年代后期中国 52 个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调查结果

民族	操本族单语人数	%	操双语人数	%	转用他族语言人数	%	% (总计)
维吾尔族	5931417	99.46	26887	0.45	5187	0.09	100.00
哈萨克族	815244	89.83	92302	10.17	0	0.00	100.00
独龙族	3983	85.99	649	14.01	0	0.00	100.00
门巴族	5110	82.14	1111	17.86	0	0.00	100.00
藏族	3158504	82.04	538106	13.39	173860	4.52	100.00
傈僳族	384058	79.70	96826	20.09	1000	0.21	100.00
拉祜族	202277	66.48	89981	29.57	11998	3.94	100.00
佤族	198466	66.46	83489	27.96	16656	5.58	100.00
景颇族	60979	65.59	31997	34.41	0	0.00	100.00
布朗族	36105	61.75	17215	29.44	5152	8.81	100.00
哈尼族	649024	61.29	408782	38.61	1000	0.10	100.00
水族	166552	58.05	103166	35.96	17190	5.99	100.00
德昂族	7132	58.00	4591	37.33	574	4.67	100.00
傣族	483168	57.55	316628	37.72	39700	4.73	100.00
朝鲜族	974207	55.19	787997	44.64	3000	0.17	100.00
彝族	3007454	55.15	2064329	37.85	381781	7.00	100.00
苗族	2756289	54.89	1243711	24.77	1021175	20.34	100.00
侗族	725331	50.85	384989	26.99	361080	22.16	100.00
蒙古族	1707583	50.06	1023380	29.99	680404	19.95	100.00
阿昌族	10060	49.23	7516	36.78	2857	13.98	100.00
基诺族	5836	48.79	6126	51.21	0	0.00	100.00
塔吉克族	12501	46.99	10583	39.79	3516	13.22	100.00
纳西族	110465	43.91	131127	52.12	10000	3.97	100.00
壮族	5659896	42.29	7323190	54.72	400000	2.99	100.00
仫佬族	35122	38.87	55235	61.13	0	0.00	100.00
瑶族	539836	38.23	447180	31.67	424950	<b>30.10</b>	100.00
白族	414891	36.64	615333	54.35	102000	9.01	100.00
布依族	774158	36.53	1154446	54.47	190741	9.00	100.00
撒拉族	24809	35.88	37826	54.71	6500	9.40	100.00
东乡族	96135	34.39	149388	53.44	34000	12.16	100.00
柯尔克孜族	37987	33.50	66264	58.44	9135	8.06	100.00
怒族	6971	30.45	4525	19.76	11400	<b>49.79</b>	100.00
黎族	261001	29.42	468111	52.77	157995	17.81	100.00
塔巴族	581	28.13	819	39.66	665	<b>32.21</b>	100.00
毛南族	10762	28.20	17797	46.64	9600	25.16	100.00
普米族	6749	27.85	10289	42.45	7200	29.70	100.00
达斡尔族	19367	20.58	66159	70.28	8600	9.14	100.00
土族	24666	15.45	76912	48.18	58054	<b>36.37</b>	100.00
裕固族	1530	14.48	6409	60.65	2629	24.87	100.00
保安族	846	9.38	5105	56.62	3066	<b>34.00</b>	100.00
锡伯族	7473	8.93	19891	23.77	56319	67.30	100.00
羌族	7094	6.90	56929	55.37	38792	<b>37.73</b>	100.00
京族	500	3.82	8238	62.84	4370	<b>33.34</b>	100.00
鄂温克族	565	2.90	16435	84.73	2398	12.36	100.00
土家族	50396	1.78	149604	5.27	2636814	92.95	100.00
鄂伦春族	29	0.70	2074	50.55	2000	48.74	100.00
畲族	566	0.15	399	0.11	371000	99.74	100.00
乌兹别克族	0	0.00	5013	41.05	7200	58.95	100.00
塔塔尔族	0	0.00	1032	25.04	3090	74.96	100.00
赫哲族	0	0.00	220	14.78	1269	85.22	100.00

<sup>1</sup> 2010 年普查我国俄罗斯族人口为 16136 人, 长表涵盖 3209 人, 其中族内婚仅有 455 人 (14.2%)。塔塔尔族人口为 3544 人, 长表涵盖 824 人, 其中族内婚仅有 198 人 (24%)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2012: 507, 597, 508, 610), 七普相关数据尚未公布。

仫佬族	0	0.00	6696	12.36	47468	87.64	100.00
满族	0	0.00	500	0.01	4304481	99.99	100.00

资料来源：何俊芳，1998：92-93。表中缺回、俄罗斯、塔塔尔3族数据。

表2对表1中52个民族1980年代中后期的语言使用结构进行了归类，反映出当时中国各少数民族之间在语言使用方面即存在很大差异：（1）各族人口中只讲本族语言的比例超过70%的，只有6个民族。其中人口规模较大且聚居的是维吾尔族、藏族和哈萨克族；（2）各族人口中使用双语（本族语与其他语言）比例超过50%的有17个民族，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南地区；（3）各族总人口中转用他族语言的比例高于本族人口30%的民族有16个，其中转用其他语言比例超过70%的有6个民族。如果再加上表1没有包括的回族、俄罗斯族和塔塔尔族，就达到9个。回族、满族完全使用汉语，土家族和畲族转用汉语的人口比例为92.95%和99.74%。这些数字说明，四十年前中国各民族中已有相当部分使用双语或者转用他族语言。尽管我们无法得到更早时期或近期的语言调查数据，这次调查所获数据仍然为我们勾勒出中华民族内部各群体在语言方面具有“多元一体”特征的基本格局。这个基本格局就是我们理解和思考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社会背景。

表2、1980年代中期各族语言使用情况分类

语言使用情况	所占比例	民族(个)	所占比例	民族(个)	所占比例	民族(个)
只使用本族语言人口	≥70%	6	≥50%	19	≥30%	32
使用双语人口	≥70%	2	≥50%	17	≥30%	30
已转用其他民族语言人口	≥70%	6	≥50%	8	≥30%	16

### 三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社会交流和学校教育中的应用

#### （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交流学习功能和教学语言设置

系统分析中国各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基本态势和上述80年代各族语言使用的调查数据，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分析1949年后中央政府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和建立少数民族教育体系的宏观社会背景。如果从语言、文字在社会交流和学校学习基本工具性功能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各民族大致可归纳为4种情况（表3）。

表3. 族群语言文字的交流与学习功能分析

族群分类	语言			文字			
	本地基层社区交流功能	本地城镇社会交流功能	跨族群地区交流功能	双语教学辅助语言	双语教学主要语言	基本阅读学习功能	有效阅读学习功能
1.有语言无文字小族群	√	×	×	×	×	×	×
2.有文字，人口百万以下	√	√-×	×	√	√-×	×	×
3.人口百万以上，无本族语言完整教育体系	√	√-×	×	√	√-×	×	×
4.人口百万以上，已有本族语言完整教育体系	√	√-×	×	√	√-×	√	×

√：具有较强功能； √-×：仅具有部分功能； ×：基本上没有功能。

来源：马戎：2004：383.

（1）一些族群从未产生独立文字且人口规模较小。政府为其创设的“新文字”实际上难以发挥学习和交流功能，仅仅作为“民族平等”的政治象征，没有实质应用性价值，更难以进入学校开展“双语教学”。

有独立文字但人口规模大小不等的各族可进一步分为三类：

(2) 对有独立文字, 但人口在百万以下而且从未形成本族文字教育体系的群体, 考虑到其文字的实际应用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不宜花费很大人力物力创立使用该文字的教学体系。主要原因是缺乏精通该文字的数理化专业人才来翻译编写该族文字的专业教材, 翻译成本巨大且质量难以保证。即使勉强编出, 也会因为使用人口规模过小在教育出版系统中难以持续。但是, 当地族群语言在小学期间仍可作为教学辅助语言, 以帮助少数民族学生顺利完成学习语言过渡。同时, 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设立相应语言研究专业, 招收语言专业人才学习和研究正在消亡中的各种语言文字。这是国家研究机构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3) 对有独立文字、人口具一定规模但尚未形成以本族语言教学语言体系(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族群, 其文字出版物的内容与数量不能满足在校学生的学习要求, 更无法满足本族知识分子学习与阅读的基本需要。由于这类文字不可能成为当地社会普遍通用文字, 缺乏实际应用性, 难以成为该族学童的教学工具。但是, 如果该族部分民众强烈要求以本族文字为学校教学语言, 可根据民众愿望编制辅助教材, 同时专设若干学校为那些愿意学习本族文字的学生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 以保障由宪法规定的文化平等权利。

(4) 对已经形成以本族语言文字为教学语言完整教育体系的 5 个民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sup>1</sup>, 以母语作为学校教学语言已有一定基础, 其文字出版物可以满足本族青少年学习知识的基本需求。但是, 由于本族文字出版物信息量与前沿性有限, 因此这些族群的知识分子仍然需要阅读汉文或外文出版物来吸收现代社会最新知识与信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这一趋势在不断强化。对于各族学生在学校里使用哪种语言(母语或汉语)作为教学工具, 多年来政府一直提供选择机会<sup>2</sup>。这些地区以少数民族学生为对象的“民族教育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和加强, 提供良好的教学条件。与此同时, 各族学生是进入以母语为教学语言的少数民族学校还是以汉语为教学语言的普通学校就读, 应当尊重学生和家长的自愿选择权(马戎, 2004: 383-384)。

## (二) 苏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和教育体系对中国的影响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和建立自治地方过程中, 中国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教育管理机构 and 少数民族教育体系, 这与当时中国政府受苏联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化”政策的影响密切相关。苏联中央政府“大量建立民族语学校, 推广使用民族语言, ……使得各少数民族学生都享受到了母语教育”。“民族共和国和州的中小学改用当地居民的本族语言教学。加盟共和国的高等院校也改用本地语言教学, ……加盟共和国的所有报刊和图书出版也都改用本地民族文字出版”(左凤荣、刘显忠, 2015: 96, 99)。但是苏联解体过程中及此后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 也引发人们对当年“民族化”政策的反思: “按民族特征建立共和国、自治州及所划分的民族区划, 虽保证了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 但也导致了少数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 民族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增强”(左凤荣、刘显忠, 2015: 101)。

苏联的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由于少数民族教材质量偏低, 导致以少数民族文字教材学习的学生各科成绩普遍较低, 不利于学生的升学及就业。同时, 俄语在苏联各共和国就业市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通用语言, 体现出更强的实用工具性效能。所以, “自 1930 年代末开始, 俄语被有针对性地向苏联民族地区的各个学校推行, 成了法定的教学课程”(左凤荣、刘显忠, 2015: 121), 此后俄语教学在各共和国教育体系中持续加强。

苏联建国初期, 曾经出现把少数民族文字转换成拉丁字母的工作。1937 年, 苏联中央执委会民族院拟定了“把北方民族的文字从拉丁字体(北方民族的文字起初是在 1920-1930 年代根据

<sup>1</sup> 如“朝鲜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就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民族教育体系’”(潘启富, 2006: 121)。

<sup>2</sup> 以母语文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并在考试中使用母语文试卷的少数民族学生, 通常称作“民考民”。以国家通用语言为教学语言的少数民族学生, 称作“民考汉”。那些在少数民族学校并以少数民族语言为教学语言的汉族学生, 通常称为“汉考民”, 此类学生人数很少。

拉丁字母造出来的)改为俄文字体的决议。1920年代,突厥斯坦各族人民传统的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但是“由于采用拉丁字母,更接近西欧文化,而不是俄国文化。为了消除西欧文化在他们中间的影响,使他们更多地受到俄国文化的影响,(苏联政府)在中亚各共和国和阿塞拜疆用俄文字母代替了拉丁字母”(左凤荣、刘显忠,2015:121)。

苏联为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立文字以及调整各族文字字母的做法,也影响了新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1954年经政务院批准的《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指出:“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的自由,同时不论已有文字或还没有文字的各民族,凡是自愿学习和使用汉语文或其他民族语言文字者,各级政府应予以保障和帮助”(何俊芳,1998:71)。1956年政府组织了7个民族语言调查队,帮助壮、彝、布依、苗、侗、哈尼、傣、黎、佤和纳西等10个民族制定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分别设计了两种傣文改革方案,帮助景颇族、拉祜族改进了原有的拉丁字母文字,帮助原来使用阿拉伯字母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设计了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马寅,1981:17)。

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青岛会议上提出:“没有文字的,要按照本民族的意愿帮助他们创造文字。在民族自治地方,主要民族的文字应该成为第一种文字”(周恩来,1957:268),将其视为“民族化”的重要内容。1958年他进一步提出:“汉语现在既然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字母,那就应该确定这样一个原则:今后各民族创造或者改革文字的时候,原则上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且应当在字母的读音和用法上尽量跟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转引自王永庆,2008:198)。在设计文字方面希望少数民族文字通过选用拉丁字母而提高与汉语拼音的共性,以此增强各少数民族对主流社会的文化认同与交流,这与苏联推行少数民族字母俄文化的思路是相同的。

#### 四、中国政府为5个少数民族建立完整的母语教育体系

##### (一)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取得的成绩

建国后不久中国各级政府即建立了管理少数民族教育的行政体系。1952年4月政务院做出《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决定》,在教育部设民族教育司,“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人口10%以上或虽不及10%而民族教育工作繁重的省、市教育厅(处)局,应视其具体情况,设专门机构……民族教育行政机构与同级的高等、中等、初等教育机构分工原则:关于全国统一的一般的教育行政、经费、师资、学制、课程、教材等事项,仍由各主管司、处、科负责处理;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行政、经费、师资、学制、课程、教材等特殊问题,由民族教育司、处、科或所设专人负责处理”(吴明海,2006:300-301)。

为了落实民族平等的政治纲领和保护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化,1951年经政务院批准的《关于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的报告》指出:“关于少数民族教育中的语言问题,会议规定凡有现行通用文字的民族,如蒙古、朝鲜、维吾尔、哈萨克、藏族小学和中学的各科课程必须用本民族语文教学。有独立语言而尚无文字或文字不全的民族,一面着手创立文字和改革文字,一面得按自愿原则,采用汉族语文或本民族所习用的语文进行教学。……各少数民族的各级学校按照当地少数民族的需要和自愿设汉文课”(谢启昆,1989:188-189)。

参照苏联的少数民族教育模式,中国政府为上述5个已有成熟语言文字体系、人口有一定规模的民族(维吾尔、蒙古、藏、哈萨克、朝鲜)的自治地方逐步建立起以汉语为教学语言的“普通学校”和以当地民族母语为教学语言的“民族学校”平行运行的双轨教育体系。这是一个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母语授课院系)的完整“民语”教育体系。例如内蒙古各高等院校设有“蒙授理科”“蒙授文科”相关专业。此后,这5个少数民族的学生可以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直至博士生阶段一直在母语文教育体系中学习。这些“民族学校”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由少数民族教师使用本族语言文字教材给本族学生上课。在民族学校只有为数极少的汉族教师和

汉族学生，学生在校学习的所有课程——除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普通话）课程外——都使用本族文字教材，用本族语言讲授。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教材也由本地区编写，并使用母语讲授(如同内地省市中小学的英语课主要用汉语讲授)。各自治地方通常为这些民族学校提供更多办学经费和更高的学生生活补助标准（潘启富，2006：121）。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据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石墨在2020年9月4日发布会上介绍：全自治区独立设置少数民族幼儿园451所，其中民族语言授课幼儿园430所，在园幼儿5.34万人。独立设置少数民族普通中小学校479所，其中民族语言授课学校430所，在校学生18.28万人。42所高校开设100多个蒙汉双语授课专业和少数民族预科班，在读学生3.45万人<sup>1</sup>。内蒙古大学有12个蒙授文科专业，2个蒙授理科专业；内蒙古师范大学有26个蒙授专业（含6个蒙汉混合班）。形成了涵盖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一个蒙语授课教育体系。2016年发布的《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条例》对民族学校的招生、教师工资待遇、经费标准、学生学费、毕业生就业等，都提出具体的优惠政策。

50年代政府组织专业人员创制了壮语文字并改进了彝语文字，同时在相应自治地区的学校开设壮文和彝文语言课程<sup>2</sup>。由于新创文字出版物几乎完全没有读者，壮语、彝语在学校里的主要功能是对尚未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的少数民族学生提供辅导性语言工具。因为使用壮文、彝文教材的人数规模很小，实际上被视为体现“民族平等”的文化符号。

表4. 中国各民族3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水平（2020）

民 族	3岁及以上人口	未上过学	学前教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硕士生	博士生	大学专科以上
	合计	%	%	%	%	%	%	%	%	%	%
总 计	100.0	3.55	3.90	25.56	35.60	15.51	8.21	6.88	0.69	0.09	15.88
汉 族	100.0	3.30	3.78	24.87	35.87	15.93	8.40	7.02	0.72	0.10	16.25
蒙古族	100.0	2.77	4.39	24.46	31.36	13.96	<b>10.16</b>	<b>11.58</b>	<b>1.19</b>	<b>0.15</b>	23.07
回 族	100.0	6.88	4.84	31.21	30.04	12.55	6.94	6.83	0.63	0.08	14.48
藏 族	100.0	23.08	5.03	39.10	14.29	6.91	6.41	4.97	0.17	0.02	11.58
维吾尔族	100.0	2.68	7.81	36.85	33.07	10.02	6.01	3.44	0.09	0.01	9.56
苗 族	100.0	7.59	4.95	35.93	33.37	9.60	4.57	3.78	0.19	0.02	8.56
彝 族	100.0	9.39	5.53	42.56	26.39	7.98	4.57	3.42	0.14	0.02	8.14
壮 族	100.0	3.44	5.01	29.17	39.83	12.38	5.84	4.11	0.20	0.02	10.17
布依族	100.0	7.98	5.19	34.42	34.14	8.93	4.53	4.62	0.17	0.02	9.33
朝鲜族	100.0	1.11	2.46	13.49	39.88	23.22	7.91	10.62	1.07	0.22	19.83
满 族	100.0	1.76	3.74	23.78	39.83	12.63	8.32	8.82	0.99	0.12	18.25
侗 族	100.0	5.23	4.82	31.15	36.17	11.14	5.86	5.34	0.25	0.03	11.47
瑶 族	100.0	5.44	5.50	35.11	33.95	10.97	4.88	3.88	0.25	0.03	9.03
白 族	100.0	4.30	4.33	30.68	33.65	11.83	7.38	7.28	0.48	0.07	15.22
土家族	100.0	3.49	4.40	30.08	34.75	14.37	6.52	5.87	0.46	0.06	12.91
哈尼族	100.0	9.66	4.33	44.15	26.95	7.86	4.27	2.67	0.10	0.01	7.05
哈萨克族	100.0	1.70	5.67	32.16	32.71	12.44	8.79	6.36	0.15	0.02	15.32
傣 族	100.0	9.47	4.38	41.76	28.35	8.05	4.55	3.28	0.14	0.01	7.98
黎 族	100.0	4.08	4.56	25.94	45.87	11.27	4.88	3.29	0.10	0.01	8.28
傈僳族	100.0	12.65	4.79	46.50	24.35	5.95	3.30	2.37	0.08	0.01	5.76
佤 族	100.0	10.20	4.18	46.29	27.26	6.52	3.47	2.03	0.06	0.00	5.56
畲 族	100.0	4.90	5.52	35.08	30.35	12.07	6.00	5.61	0.41	0.05	12.08
高山族	100.0	2.11	5.98	17.95	25.32	17.50	12.45	15.94	2.47	0.27	31.13

<sup>1</sup> <https://mp.weixin.qq.com/s/dK4j27PqsjyFjGtP16ulZQ> (2020-9-10)

<sup>2</sup> 例如四川彝族地区的教育采取“两种模式”（教学以汉语为主开设彝语课，以彝语为主开设汉语课）、三次分流（小学和初中按上述两种模式分流，以彝语教学为主的学生在升入初中、升入高中时再次重新分流）（吴明海，2006：387）。

拉祜族	100.0	12.83	4.25	50.80	22.26	4.78	2.79	2.17	0.10	0.01	5.07
水族	100.0	7.58	5.46	36.71	31.68	9.14	4.44	4.82	0.16	0.01	9.43
东乡族	100.0	17.41	8.30	48.64	17.68	4.33	1.87	1.70	0.06	0.01	3.64
纳西族	100.0	5.20	4.09	27.21	31.05	13.46	9.67	8.64	0.60	0.08	18.99
景颇族	100.0	9.61	4.76	38.19	30.31	9.06	4.97	2.94	0.13	0.01	8.06
柯尔克孜族	100.0	2.65	6.98	38.52	25.47	11.88	8.95	5.42	0.11	0.02	14.50
土族	100.0	8.45	4.98	34.40	24.17	10.25	7.74	9.52	0.42	0.06	17.75
达斡尔族	100.0	1.46	4.19	18.62	34.57	15.24	11.96	12.40	1.36	0.19	25.92
仫佬族	100.0	3.42	6.09	30.56	32.95	12.47	7.22	6.80	0.45	0.05	14.52
羌族	100.0	5.95	4.49	34.37	26.73	11.05	9.31	7.56	0.49	0.06	17.41
布朗族	100.0	12.96	4.68	44.32	24.43	6.46	3.69	3.29	0.15	0.03	7.16
撒拉族	100.0	15.90	6.09	44.71	19.97	6.42	3.11	3.67	0.13	0.02	6.92
毛南族	100.0	3.30	5.71	30.12	36.86	11.48	6.20	5.98	0.31	0.03	12.53
仡佬族	100.0	5.36	5.38	31.01	31.70	11.30	6.65	8.20	0.35	0.04	15.24
锡伯族	100.0	1.10	4.13	17.67	36.67	15.26	11.30	12.33	1.35	0.20	25.17
阿昌族	100.0	7.65	5.57	37.14	30.68	9.13	4.94	4.72	0.16	0.01	9.83
普米族	100.0	8.69	5.56	33.59	26.25	10.47	8.02	7.06	0.32	0.04	15.44
塔吉克族	100.0	2.03	5.92	41.02	23.88	14.47	10.16	2.48	0.04	0.00	12.68
怒族	100.0	11.51	7.28	39.15	25.39	7.06	5.49	4.00	0.11	0.01	9.61
乌孜别克族	100.0	1.48	6.56	26.85	25.23	15.33	11.59	12.25	0.56	0.14	24.55
俄罗斯族	100.0	1.22	4.88	12.16	23.55	18.41	17.37	20.21	1.94	0.26	39.78
鄂温克族	100.0	1.64	4.69	19.83	30.84	16.18	13.21	12.40	1.07	0.13	26.81
德昂族	100.0	11.52	5.61	46.01	25.14	6.64	3.04	1.98	0.05	0.01	5.08
保安族	100.0	12.54	8.45	41.48	20.61	8.60	4.50	3.70	0.10	0.01	8.31
裕固族	100.0	3.25	4.29	30.44	22.77	12.72	11.32	13.96	1.12	0.14	26.53
京族	100.0	3.14	8.64	25.48	32.06	14.64	7.99	7.55	0.46	0.03	16.03
塔塔尔族	100.0	1.54	4.85	21.08	21.95	15.97	15.45	17.13	1.71	0.32	34.61
独龙族	100.0	9.16	5.99	34.93	30.11	8.48	7.08	3.96	0.20	0.09	11.33
鄂伦春族	100.0	1.64	5.71	15.95	27.10	15.07	16.39	16.29	1.61	0.23	34.52
赫哲族	100.0	1.19	5.53	15.15	28.12	14.57	13.06	19.08	2.81	0.49	35.44
门巴族	100.0	27.25	6.43	28.21	11.74	9.57	8.41	8.13	0.26	0.01	16.80
珞巴族	100.0	20.29	6.94	38.84	11.94	6.99	5.53	9.33	0.13	0.03	15.01
基诺族	100.0	7.25	4.19	32.82	34.12	10.04	7.07	4.28	0.22	0.02	11.59
未定族称	100.0	10.48	5.29	34.28	30.65	9.22	4.74	5.13	0.17	0.02	10.07
外国人入籍	100.0	10.60	4.22	27.78	31.90	9.53	7.78	7.42	0.58	0.20	15.98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22a：269-272。

2020年人口普查提供了各民族3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数据（表4），显示各族之间在接受学校教育情况方面的差距仍然十分显著：

（1）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居住分散，现代学校教育自1950年代才起步，2020年仍有20-27%的人口从未接受任何学校教育。而占全国总人口96.8%的汉族仅有3.3%未接受过任何学校教育；

（2）汉族中接受过小学教育的占24.9%，同时另外11个民族仅仅接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口高达40%以上；

（3）接受过大学专科以上教育者比例较高的族群（俄罗斯族39.78%，赫哲族35.44%，塔塔尔族34.61%，鄂伦春族34.52%，高山族31.13%，乌兹别克族24.55%、裕固族26.53%）总人口都低于2万人。鄂温克族（26.81%）、锡伯族（25.18%）的总人口为3.46万人和19万人。汉族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16.25%，低于蒙古族（23.07%）、朝鲜族（19.83%）和满族（18.25%）。

## （二）在教育领域由政府制定推行的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优惠政策

为了辅助和支持少数民族发展现代学校教育。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制定了教育领域里以少数民族为对象各类优惠政策，涵盖少数民族学校的设置建设、经费支

持、民语教材编写、各级学生招生工作中的降分录取、教师福利以及少数民族在校学生的各项福利优惠政策等。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条例》可以作为一个案例。该《条例》有如下规定：第二十五条“招收蒙古语授课为主加授汉语的高考学生，应当**单列招生计划、单独划定录取分数线**、统一录取。”第二十九条“双语教学民族幼儿园、中小学校教师**工资待遇**应当适当高于同级同类学校的其他教师。民族学校设置的教师专业技术岗位，**高级岗位比例**应当高于同级同类其他学校”。第三十八条“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核定民族幼儿园、中小学校**公用经费**时，补助标准应当**高于**当地同级同类学校标准”。第四十二条“自治区对考入区内高等学校的蒙古语授课为主加授汉语学生，**减收百分之二十学费**，所需资金由自治区财政承担”。第四十三条“公务员考录、事业单位招聘人员时，每年应当从录用计划总数中，划定**不低于百分之十五的职位用于蒙古语授课大学毕业生**。国有企业招录人员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蒙古语授课大中专毕业生”。<sup>1</sup>

1980年10月19日国务院、国家民委《关于加强民族工作的意见》提出“高考招生，应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择优录取和规定比例录取，其比例应不低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此后，新疆规定高校录取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不低于50%（马戎，2012a：200）。为了保证录取比例，只能对少数民族考生实行加分或降低录取分数线的政策。在相关思路指导下，全国各省市和民族自治地方在高考招生过程中都制定了程度不同的优惠政策。一些研究详细介绍了2014年全国各省市高校招生中对少数民族考生给予加分的优惠政策（王凡妹，2015：550-556）。表5介绍2019-2021年新疆高考录取分数线，以理科一本的录取分数线为例，2021年汉族考生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考生的录取分数线相差101分（表5）。同年，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学生数学单科分数线仅为32分（汉族考生的数学单科录取分数线为90分）。近几年各地优惠政策的幅度有所下降。如2022年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考生和汉族学生的录取分数线分别为400分和359分，差距减为41分，2023年分别为457分和422分，差距减为35分。2023年取消少数民族高考加分的有山东、江西、辽宁、天津、湖南、广西、海南、贵州等多个省份<sup>2</sup>。

表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考分数录取线（2019-2021）

	学生	文科			理科		
		本科一	本科二	(高职)专科	本科一	本科二	(高职)专科
2019	汉语	510	387	180	450	326	180
	民语 (数学单科)	345 (31)	302 (29)	从高到低	295 (35)	240 (32)	从高到低
	单列	408	338	180	365	284	180
	双语	347	314	180	325	270	180
2020	汉语	482	370	180	431	317	180
	民语 (数学单科)	345 (34)	256 (29)	从高到低	288 (36)	228 (32)	从高到低
	单列	397	343	180	358	294	180
	双语	346	322	180	333	278	180
2021	汉语	466	350	140	405	302	140
	民语 (数学单科)	315 (29)	269 (29)	140	304 (32)	263 (32)	140
	考外语	347	263	140	305	248	140

### （三）民族教育体系的母语教材质量和教学效果

<sup>1</sup> [http://tyjrswt.nmg.gov.cn/sjwy/zwgk\\_sj/gknr/zcfg\\_sj/202103/t20210315\\_1167703.html](http://tyjrswt.nmg.gov.cn/sjwy/zwgk_sj/gknr/zcfg_sj/202103/t20210315_1167703.html)（2024-2-22）

<sup>2</sup> <http://www.creditsailing.com/XinWenFaBu/2825121.html>（2024-2-23）

尽管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数理化教材大多译自汉文版教材，但是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笔者2005年在喀什第二中学调查时，多名维吾尔族学生表示如果想学好数学课，也必须阅读汉文数学教辅材料。笔者比较了内蒙古大学、新疆大学、西藏大学这3所当地最好高校的图书馆藏书情况，发现新疆大学图书馆的“社会学类”图书中，维吾尔文仅有100种，汉文有2338种，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社会学”类汉文图书有11613种。而且维文图书大多是入门读物。内蒙古大学图书馆的“社科总类”图书中，蒙文仅有22种，汉文有8385种。西藏大学图书馆“社科总类”图书中，藏文有43种，汉文有3985种（马戎，2012a：281-283）。随着中央政府在新疆、西藏等地区大力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教育，中小学的数理化课程逐步改用国家通用文字教材，显著地提高了藏族、维吾尔族学生的考试成绩。在2022年和2023年的大学高考录取中，新疆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学生理科录取线的降分幅度已经分别减少为41分、25分。优惠力度明显降低。

2020年中国6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受教育水平的相应人群分别为158万人（蒙）、110万人（维）、78万人（藏）、33万人（朝）和23万人（哈）（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22：259-261），而汉族有20269万，加上通用汉语的回族158万人、满族184万人、壮族192万（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22a：269-272）。凭靠庞大的读者群，汉文出版物的优势地位与各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如果把“大专及以上学历”受教育水平人群视作潜在读者群，假如一本出版物可在这个潜在读者群中吸引万分之一的人购买，汉文本可卖掉2万册，蒙文译本只能卖掉158本，维文译本110本，藏文译本78本。由于读者少加之专业分散，这几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的购买人数越来越少，这是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出版工作规模小、每年须由国家巨额财政补贴勉强维持的主要原因。以民族文字出版物为基础的少数民族母语教学，今后的路可能会越走越窄。这一趋势完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情感为转移。对于中国各少数民族青少年来说，汉文出版物这个丰富的知识信息宝藏是绝对不应忽视的。一个14亿人的汉文读者规模，完全可以支撑起汉文出版业（包括大量外文图书的中译本）的销售市场，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教材和出版物完全无法与之相比的。在今天的全媒体交流学习环境中，只有掌握汉语才能享受信息社会的便利。

同时，那些从民族语文教育系统毕业的高中生，如果希望继续在母语环境中学习，他们在大学考试的专业选择方面受到极大限制。内蒙古高等院校里仍保留了蒙授文科、蒙授理科专业，但是考进新疆大学、西藏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母语专业之外的选择范围非常小，而且他们很难进入内地大学。这对他们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开拓未来的就业空间业非常不利。我们在内地高校校园里见到的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学生，绝大多数属于“民考汉”学生（即从小学开始在汉语学校学习，高考使用汉文试卷）或者“内地班”学生（从初中或高中即在内地学校使用汉文教材）。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和掌握汉语文的能力，在他们毕业后求职时也是重要的竞争条件。

今天用汉文编写的各科教材和课外读物，除部分《语文》《历史》等科目的教学内容外，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更不是汉族的文化，教材内容主要是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数理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专业知识体系。我们的教育制度（学前、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和学科体系也是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后引进的西方学制。所以，简单地把汉文教材视为“汉族文化知识体系”，认为学习这些教材就是被“汉族同化”（汉化），完全是无知的偏见。鸦片战争后，中国被洋枪洋炮轰开了大门，今天中国人建造的房屋、穿戴的服装、使用的工具，从设计到外观主要是工业化推行后的国际流行式样，我们的教育体制、学科设置以及数理化等专业教科书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国家知识体系的引进，具有现代文明标准化的印记。所以，我们应当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社会的种种变化，理解中央政府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对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培养现代化事业急需人才的时代意义。由于长期以来这种各学科系统性“知识输入”的态势，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时代

命题，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行动指南。

由于民族学校的民文数理化教材水平比不上汉文教材，严重影响学习效果和考试成绩。加上沿海和中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如果不能熟练掌握汉语和提高专业技能就难以在这些地区就业，因此内蒙古一些少数民族学校出现学生流失现象，前文援引的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条例》，即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加强优惠政策力度来“留住”蒙古族学生和“巩固”民族教育体系的尝试。

## 五 关于推动少数民族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讨论

### （一）如何认识“汉语文”和国家通用语言学习

如何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推动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现代化，涉及多个深层次的议题。就全国范围而言，中国应用性最强最普遍的语言是汉语文。回、满、赫哲、土家、锡伯、畲族等民族的绝大多数以汉语为自己的语言，另一些民族（蒙古、藏、壮、撒拉、苗、瑶、东乡、土、保安、羌、仡佬、白族等）有很大比例的干部群众通用汉语、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大部分通晓汉语，汉语文在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客观上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国家通用语言”，而不能仅从名称和历史上的情况简单地把今天的“汉语”顾名思义地视为只是“汉族的语言”。不但中国历史上的大量文化典籍和科技成果以汉文留存，有影响的国外文学与科技著作很快就译成汉文出版，国内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也用汉文发表出版。在中国每年的出版物中，有99%是汉文出版物<sup>1</sup>。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人如能熟练掌握汉语文，意味可以接触和使用国内信息总量的99%，这是数量巨大和无法替代的资源，掌握这些资源，无论对个人的发展和就业机构单位的发展都极为重要。

200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与此同时，“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sup>2</sup>。一方面，普遍学习和掌握汉语文是全国各族人民学习现代知识和实现就业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希望继承和发展母语的情感愿望也必须得到尊重。今天中国政府的语言政策需要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推动社会发展和兼顾民族情感二者之间掌握好平衡。

中国各民族自治地方之间在民族人口结构和各族民众的语言使用情况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如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中，蒙古族约占17%，而且农区的蒙古族民众自清末“放垦”以来因转为务农而大多习用汉语，改革开放以来有许多蒙古族来内地打工发展。2020年对“课改”提出不同意见的，主要是蒙古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相比之下，南疆一些地市的居民仍以维吾尔族为主体，如和田地区的维吾尔族占当地总人口的96%，基层乡镇完全没有汉族居民，也没有汉语使用环境，在南疆开展汉语文教学的难度可想而知。如果不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有些因素是人们预想不到的。笔者2005年在喀什进行双语教育调查，发现在小学里学了4年汉语的维吾尔族初中学生仍然不会用汉字写出自己的名字，在喀什师范学院4年本科毕业并在县中心小学讲授汉语课的青年教师，与我交流时仍需借助翻译。一位小学校长告诉我，他所在小学的教师当中相当比例的汉语水平考试证书是用钱买的，实际上这些教师完全无法用汉语授课。正是因为南疆学校的汉语教育有名无实，导致许多毕业生因无法用汉语对话交流而陷入失业困境，成为暴力恐怖活动的社会温

<sup>1</sup> 例如1993年全国共出版图书96761种，发行593372万册，杂志7011种；其中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图书3500种，发行5090万册，杂志173种（国家统计局，1994：62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国家民委经济司，1994：372）。

<sup>2</sup> [https://www.gov.cn/ziliao/flfg/2005-08/31/content\\_27920.htm](https://www.gov.cn/ziliao/flfg/2005-08/31/content_27920.htm)（2022-10-5）

床。所以，新疆教育部门强力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是非常必要的。在分析不同地区的汉语教学时，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文件出发，而是需要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实事求是，才能了解不同地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过程中的必要性和各项具体困难。

## （二）如何理解少数民族在语言和文化领域的“自治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第36条和第37条实质上强调的是少数民族在教育领域中的“自治权利”。如果回顾当年苏联关于少数民族教育议题的讨论，列宁曾经指出：“‘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在教育（或者整个‘文化’）事业上宣扬民族的隔绝，但隔绝是同保持一切（其中包括民族）特权的基础完全符合的”（列宁，1913a：241），他呼吁“铲除民族之间的种种隔膜，使各民族的儿童在共同的学校里打成一片”（列宁，1913b：304）。但是，中国一些省区至今仍然存在学校体系的“民族区隔”（普通学校和“民族学校”）并造成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在民族学校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虽然熟练掌握母语文，但是由于专业课程使用母语文教材，汉语文能力偏弱，这些民族学校的毕业生必然面临就业困境；二是民族学校的环境使学生们很难与校外通用汉语的主流社会进行交流，这必然导致文化隔膜和认同差异。列宁呼吁“使各民族的儿童在共同的学校里打成一片”，美国“民权运动”废除了学校种族隔离制度。在中国社会，这是人的发展和族际交流新形势下为保障少数民族与全国共同发展、全面参与和分享国家现代化建设成就提出的中国民族教育发展的新方向。在中华民族整体的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既要服从国家整体的发展态势和客观要求，也要站在本民族大多数普通民众在学习、就业方面客观需求的角度来看待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和国家统编教材。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积极推进民汉合校、混合编班，形成共学共进的氛围和条件”。<sup>1</sup>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内蒙古自治区从2020年起在民族语言授课学校的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教材，要求这3门课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讲授。这一政策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引发争议，一些人担心这样发展下去，有可能危及蒙古语在民族学校作为教学语言的地位，不符合《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6条的相关规定。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包银山撰文指出“民族语言授课中小学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并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国家教材使用管理的重大改革举措，是不断提升民族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水平、促进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是民族地区广大群众和学生的现实要求。”<sup>2</sup>

在各地民族语言授课的中小学使用国家统编《语文》（国家通用语言）教材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这是中央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国家教材使用管理的重大改革举措，是不断提升民族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水平、促进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是民族地区广大群众和学生的现实要求。但是，与此同时如何有效地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也是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各地区需要因地制宜，处理好新时代母语教学和国家通用语言学习二者之间的关系。

## （三）中小学教材是各族学生建立国家观、民族观、人生观的重要指导

中小学的《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教材是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人生观的重要指导。在青少年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塑造过程中，教材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如果忽视教材选用方面的正确导向，很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1962年发生在新疆的“伊塔事件”造成伊犁、塔城地区6.7万边民外逃苏联。苏联方面的鼓动怂恿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北疆学校长期使用苏联教科书，对青少年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44年开始，北疆中小学校开始学习俄文并系统采用苏联教材，一直到1958年才更换。苏联教材写的是“我们

<sup>1</sup> 习近平2014年9月28日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3684997807732007507>（2024-1-4）

<sup>2</sup> 正确理解内蒙古教材改革（内蒙古新闻网）<http://www.mbatrip.com/zonghe/2020/0908/15455.html>（2024-2-23）

的祖国是苏联，首都是莫斯科”。同时学生们接触不到汉文教育和民族文字教育，在14年中只读苏联俄文教材，这使苏联在当地各族民众心目中具有很高威望和优越感，最终造成祖国意识的淡漠。这是“伊塔事件”的深层次原因<sup>1</sup>。

另一个案例是2017年揭露的新疆“毒教材”事件。在身居政府高位的维吾尔族分裂主义分子组织和包庇下，大量含有民族分裂思想的内容被编入维吾尔语中小学语文教材，自2004年起在全自治区使用。这套维吾尔文教材从头到尾宣扬“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想，使维吾尔族学生们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出现严重偏差，形成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sup>2</sup>。在对2019年香港乱局进行反思时，香港社会各界也意识到乱局的“病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教育问题，“认识到正是前些时流行的‘毒’教材和‘黄师’把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学生煽惑成满目狰狞、侮辱国旗、攻击港警的黑暴青年”。在“2022年香港爱国主义教育高峰论坛暨爱国教育支援中心揭幕仪式”上，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理直气壮地推展爱国主义教育，香港教材的相关内容在修订之中<sup>3</sup>。自李登辉执政期间开始，台湾便开始系统地在教科书中推行“去中国化”，这即是今天台湾一些年轻人祖国意识淡漠的主要原因。我们应当通过上述事例来理解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统编教材的必要性。

#### （四）如何理解以汉文为主要载体的中华文化体系

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逐步成为东亚大陆上人口聚集、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核心区，各地区的族群在这里交流汇集，在秦统一中原后形成中华文明的主体。在各种地域性文化、人群的汇集过程中，形成了“华夏集团”和“汉人”。“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壮大，而且深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费孝通，1989：1）。在这个以“多元一体”为基本特征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统一体在发展过程中，主体的文化渗透入多元部分，而多元部分也渗透进主流文化之中，许多群体最终消融在这一族群融汇的过程之中<sup>4</sup>，其中语言使用格局是演变最显著的指标之一。

作为文化的主要传播工具，语言文字具有二重性。语言一方面是各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与象征，寄托着人们对祖先的深厚情感，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学习和交流的工具，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人们学习一种语言也许仅仅因为它是有效的学习工具，今天人们学习英语的动机就是掌握这一语言工具。作为交流工具，一种通用文字的推广和使用在族际交流中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这就是现代社会中的国家通用语言。随着社会发展和人际交流的加强，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是在国内开展社会交流和就业的需要，学习一门外语是走出国门努力学习吸收外国知识文化的需要。与此同时，一些没有文字的语言，或者虽有文字但人口规模较小族群的语言文字，其社会应用效能会在21世纪逐渐降低，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在文化交流中，不同的文化体系完全可以全方位地相互学习和彼此渗透。比如藏族歌舞可以借助现代西洋和中原乐器的伴奏，通过现代舞台设计得以升华和发展。汉族在保留传统戏曲的同时，也在欣赏交响乐、歌剧和芭蕾舞，并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符合中国人审美标准的改造。无论是在世界文化的交流范围、还是在中国社会的交流范围，语言文字出作为信息交流工具的功能越来越充分，而作为文化符号的表征意义在逐渐降低。我们在思考中国少数民族教育议题时，一定要认清这一发展的大趋势。

<sup>1</sup> 深度剖析“伊塔事件”：教育才是问题的根源！<https://mp.weixin.qq.com/s/nObzGACttQH-H1NFBjHndg>（2024-2-21）

<sup>2</sup> 事件始末之新疆“毒教材”为什么能使用长达13年？<https://zhuanlan.zhihu.com/p/521943238>（2023-11-5）

<sup>3</sup>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CI0816A0550TXTJ.html>（2-24-2-25）

<sup>4</sup> 据潘光旦先生《中国民族史料汇编》一书，仅《史记》即查出76种族称，在《左传》《国语》《战国策》《汲冢周书》《竹书纪年》查出112种族称，在《资治通鉴》查出80种族称（潘光旦，2005：1-17）。

今天我们使用的汉语，早已不是鸦片战争之前的汉语。在大量翻译西方文字的文学作品后，汉文的主要词汇、标点符号、书写方式等早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汉文出版物所呈现的内容，也早已不限于《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传统内容。所以今天我们不应把汉语简单地视为“汉人的语言”，或者把汉文出版物狭隘地视为“汉人的文化”。今天的汉文出版物是自近代以来广泛吸收世界各国科技成果、文化遗产、学术精华的知识汇集，是中国各族青少年学习先进文化和前沿科技、为个人和本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加紧追赶和超越的重要工具。

#### （五）如何协调好本族语言学习和国家通用语言学习之间的关系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已经建成全国性的交通通信网络，出现全国性劳动力和人才就业市场。2020 年中国跨省流动人口为 12484 万人。与 2010 年相比，流动人口增长 69.73%。<sup>1</sup> 手机和网络的普及使汉语文成为信息交流和经济活动的主要工具性语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已经成为各族民众加入现代发展洪流必备的交流工具，群众迫切希望尽快掌握汉语，但也担忧母语的存亡。

列宁曾对采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行“国语”的做法持明确反对态度，他认为这样做只能引起其他语言族群的反感，在一个多族群国家中任何语言也不应拥有特权，同时经济活动的发展自然会推动一种应用性最广、使用最便利的语言成为公共语言，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强制的效果恰恰适得其反。列宁指出：“俄罗斯语言对很多弱小民族和落后民族起过进步作用，这是不容争辩的”。但他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在民族关系中特别重要的少数民族的“心理状态”。“只要稍有强迫，这种心理状态就会玷污和损害集中制、大国制和统一语言的无可争辩的进步作用，并将这种进步作用化为乌有。但是，经济比心理状态更重要：俄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它使俄罗斯语言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列宁，1913b：500-501）。因此，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共同的语言作为交流工具，也需要一个经济生产上能够分工合作以降低成本的政治地理区域，语言的统一和建立全国性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进步作用。但是，语言使用方面的统一只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少数民族自愿接受一个“族际共同语”的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任何通过国家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国语”的做法，其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同时“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既要求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也要鼓励在民族地区生活的汉族群众学习少数民族语言。”<sup>2</sup>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必须同时兼顾“多元”和“一体”。政策应当张弛有度。

我们一方面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另一方面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的制度性延续。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随着国民经济和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发展，各族青少年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已经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少数民族学校加强国家通用语言课程教学势在必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关注少数民族民众对继承母语的关切和情感，努力在二者之间把握好平衡，而这无疑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作为决策基础，而且考验各级部门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

美国学者康纳（Walker Connor）把共产党国家的语言政策归纳为“三阶段模式”：（1）第一个阶段是“多元主义”政策，各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受到鼓励，政府压力对于推行国家主导地位的努力只是间接的；（2）第二阶段为“双语主义”，政府开始增加对学习国家主导语言的要求，如自 1938 年开始，苏联各民族被规定并作为义务（compulsory）要学习俄语；（3）第三阶段为

<sup>1</sup>

[https://www.360kuai.com/pc/94628a03ccf98c26a?cota=3&kuai\\_so=1&tj\\_url=so\\_vip&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 ne=so\\_1](https://www.360kuai.com/pc/94628a03ccf98c26a?cota=3&kuai_so=1&tj_url=so_vip&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 ne=so_1)（2024-2-25）

<sup>2</sup>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3778067450653452142&item\\_id=3778067450653452142](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3778067450653452142&item_id=3778067450653452142)（2024-1-4）

“统一语言”，国家主导语言成为惟一的教學语言和官方正式语言（Connor, 1984: 254-255）。回顾 1949 年建国以来中国在少数民族语言学习方面走过的 70 年历程，这位美国学者的观点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目前中国政府正在推进的语言学习进程。

#### 参考书目：

- 阿尔宾达贻、沙马·甲加，1996，《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教材建设概况》，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陈红涛，1990，《中国民族教育发展途径探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崔珂琰，2017，《中国近现代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 戴庆厦等，1999，《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丁明，2003，《战后国际关系与中国建国初“一边倒”方针的形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
- 费孝通，1989，“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第 1-19 页。
- 顾颉刚，1939，“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 年 2 月 13 日。
- 国家统计局编，1994，《中国统计年鉴》（199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国家民委经济司编，1994，《中国民族统计》（199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国家民委经济司编，2012，《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上），北京：民族出版社。
-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编，2022，《2020 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北京：统计出版社。
- 哈经雄、滕星主编，2001，《民族教育学通论》，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 韩达主编，1998a，《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一卷），广东教育出版社、云南教育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
- 韩达主编，1998b，《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二卷），广东教育出版社、云南教育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
- 何俊芳，1998，《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历史与现实》，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菅志翔、马戎，2022，“中国民族研究的概念史梳理”，《开放时代》2022 年第 5 期，第 206-223 页。
- 孔寒冰，2001，《“一边倒”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国际政治研究》2001 年第 3 期。
- 列宁，1913a，“民族问题提纲”，《列宁全集》第 1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36-244 页。
- 列宁，1913b，“给斯·格·邵武勉的信”，《列宁全集》第 1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00-503 页。
- 马戎，2012a，《中国民族史和中华传统文化》，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 马戎，2012b，《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族际交往》，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 马戎编著，2004，《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马廷中，2007，“民国政府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 年第 7 期，第 5-10 页。
- 马寅主编，1981，《中国少数民族》，北京：人民出版社。
- 潘光旦，2005，《中国民族史料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潘启富，2006，《中国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制度研究》，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 潘志平主编，1999，《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秘书组、国家民委政法司编，2002，《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通典》，

-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史金波，2024，“汉语文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际的主要工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第88-102页。
- 司永成主编，2011，《民族教育政策法规选编》，北京：民族出版社。
- 孙中山，1924，《三民主义》，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版。
- 滕星，2001，《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 滕星、王军主编，2002，《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凡妹，2015，《肯定性行动——美国族群政策的沿革与社会影响》，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 王锡宏，1998，《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本体理论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永庆整理，2008，《历史的回声——格尔夏回忆录》，乌鲁木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 吴明海主编，2006，《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谢启晃，1989，《中国民族教育史纲》，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 游艳丽，2004，《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之联系》，《北京党史》2004年增刊。
- 周恩来，1957，“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47-271页。
- Connor, W., 1984,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uny, Ronald Grigor, 1993,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编者按】**1949年新疆地区“和平解放”。在此之前，新疆经历了几十年非常复杂曲折的演变进程。新疆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曲折过程，似乎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疆社会深层次的历史“沉积”。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决不是偶然发生的。大家如果关心新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建议读一下《历史的回声——格尔夏回忆录》这本书。本期《通讯》有一篇关于国家语言政策的论文，因此选录该书回忆20世纪60年代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第五章，供大家参考。（马戎）

## 【文献选登】

### 第五章、新疆民族文字改革

选自《历史的回声——格尔夏回忆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08年，第192-212页。

#### 1、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渊源

新疆少数民族文字的改革曾经有一段历史渊源。

早在20世纪30年代，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标榜亲苏政策。1933年，赛都拉·赛甫拉也夫等人从苏联回来，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进步思想影响下，曾经在维吾尔、哈萨克和蒙古族的部分中小学里，推行过以斯拉夫文字为基础的文字改革。

我那时还在乌苏县四棵树上小学，校长蒙克那生和教师艾尔德尼都是从苏联过来的，他们上课就教我们学习斯拉夫字母，对蒙古托忒文字用斯拉夫字母拼音进行教学。

1937年，我考进迪化市的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简易师范，在学校的教学中，蒙古托忒文字也和斯拉夫字母拼音同时使用。当时我们这些学生，只知道苏联来的教师这样教法好懂、好学，并不知道什么叫文字改革。

1943年，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盛世才反苏、反共，赶走了苏联来的教师，取缔了一切进步的改革，不准再使用斯拉夫文字进行少数民族文字的改革。所以，新疆解放前这段少数民族文字改革，不过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

#### 2. 成立新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会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大力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改革进步。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刚刚建立，就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后为国家文委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并首先进行了汉字的改革。从1955年起，大力推广汉字的简化，又制定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汉语拼音方案”，同时也帮助各少数民族进行文字改革。

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影响和中央的关怀下，成立了“新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阿不都拉·扎克洛夫任乌鲁木齐市的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主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长贾哈达，担任伊犁州的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主任。但是他们提出的文字改革方案，却又回到了20年前曾经用过的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方案。

然而历史已经掀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决定统一使用拉丁字母进行汉语拼音的文字改革，如果再继续坚持使用斯拉夫字母进行文字改革，就必然会违背全国统一的方针、原则。

1957年8月，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在青岛举行，周总理作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周总理在会议上指出：“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一方面，如果在汉族中还有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就会产生民族歧

视的错误；另一方面，如果在兄弟民族中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分裂的倾向。

“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家庭，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哪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我们五十多个民族所共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所共有。”

这次新疆去了十多位代表参加会议，其中有赛都拉·赛甫拉也夫、安尼瓦尔·贾库林、帕提汗·苏克尔巴也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库夫、瓦哈甫、达夏甫、阿满土尔、维吾尔·沙衣热诺、巴塔等。

8月，自治区党委在天山大厦召开会议，由赛甫拉也夫等同志传达青岛会议精神。

我在会议上听了赛甫拉也夫传达的周总理的报告，对我的教育特别深刻。

周总理在报告中说：“历史的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不去强调民族分立。现在若要强调民族可以分立，帝国主义就正好来利用。即使它不会成功，也会增加各民族合作中的麻烦。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动分子进行东土耳其斯坦之类的分裂活动，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有鉴于此，在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我们没有赞成采取维吾尔斯坦这个名称。新疆不仅有维吾尔一个民族，还有其他十二个民族，也不能把十二个民族搞成十三个斯坦。党和政府最后确定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同志也同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帽子’还是戴着维吾尔民族，因为维吾尔族在新疆是主体民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戴这个帽子，至于‘新疆’二字，意思是新的土地，没有侵略的意思，和‘绥远’二字的意思不同。

“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裂，民族‘单干’。我们民族大家庭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我们普遍地实行民族的自治，有利于我们发展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我们不想要民族分裂，更不应该想民族‘单干’。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基础上，建立起我们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

1958年1月，周总理又在全国政协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

周总理开宗明义地指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关于简化汉字问题，周总理指出1956年国务院已经公布了355个简化字，两年来，简化字已经在报纸、刊物、课本和一般书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特别是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确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们应该从六亿人口出发来考虑文字改革的问题，而不是从个人的习惯和一时的方便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当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汉字简化是符合群众利益并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好事，两年来的试用也证明是有效应的，应该坚决支持。

关于推广普通话问题，周总理指出，我国汉民族语言还存在着很严重的方言分歧。其中大量的是语言方面的问题。不同地区的人，如果各说各的方言，往往不容易相互了解。

周总理又指出：“解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历史上的空前统一，全国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人民就越来越感觉到使用一种共同语言的迫切需要。因此，在我国汉族人民中努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不是要禁止或者消灭方言？当然不是的。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

### 能用人为的方法来消灭。

“要把六亿汉族人口的方言逐渐统一起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作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

至于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周总理说：“首先，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其次，汉语拼音方案还可以用来拼写普通话，作为教学普通话的有效工具。学习普通话光靠耳朵和嘴巴是不够的，学了容易忘记，必须有一套标音符号，用来编印拼音的读物和注音的字典，供学习的人随时查考，不断校正自己的发音，收效才大……今后我们采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是科学技术等方面广泛使用的，大家使用和接触的机会很多，学过之后就不容易忘记。因此，采用这套字母，对于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好处。”

周总理还说：“汉语拼音方案可以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我国有五十多个民族，其中有许多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另外一些民族虽然有文字，但是也需要改进。已有文字的民族中，除汉族用汉字外，有用藏文字母的，有用蒙文字母的，有用阿拉伯字母的，有用朝鲜字母的，还有用其他字母的。这些兄弟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时候，应该以什么字母为基础呢？能不能就用汉字作为各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础呢？过去曾经有人这样试过，没有成功，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几十个民族大家各搞一套字母，这不仅对于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经验是个障碍，而且印刷、打字、电报的设备势必各搞一套，对于各民族今后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极其不利。”

汉语现在既然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字母，那就应该确定这样一个原则：今后各民族创造或者改革字母的时候，原则上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且应该在字母的读音和用法上尽量跟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可以预料，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对于各兄弟民族的创造和改革文字，以及今后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学习和沟通，将有极大的利益。”

“汉语拼音方案可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1958年4月，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改革讨论会，这次会议明确规定了帮助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原则和方针，就是必须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拉丁字母进行文字改革，有文字的民族按这个统一的方针进行改革，没有文字的民族也按这个方针创制文字。

这次会议，赛甫拉也夫同志也去参加了，当然知道会议的决定合周总理的讲话精神。然而，这些精神在他领导研究会的整个阶段，却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 **3. 排除干扰，坚持进行民族语言文字改革**

1959年，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作出决定，撤销原有的新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了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维吾尔、哈萨克拉丁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

委员会主任先后由阿不都拉·扎克洛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克夫、赛福鼎担任。赛福鼎兼任党组书记。我兼任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还有一位副主任是艾里哈木·艾合塔木。并决定立即开始在部分的维吾尔、哈萨克族学校，进行新文字改革的试点工作。

1960年2月，我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调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返疆后便立即全力投入了“文改会”的工作。

我首先了解了各试点学校推行新文字的进展情况，感觉到一个时期以来，新疆文字改革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由于新文字方案是国家文委研究会帮助制定的，经过大批的学者、专家反复讨论、修改，新文字方案已经达到了科学完善的程度，所以实行起来很少遇到技术性问题。

而青少年学生又最能接受新事物，对新文字感到新鲜、优越，学习的积极性很高，很快掌握了新文字的入门。

广大青少年普遍欢迎新文字的事实，极大地增强了我对“文改会”工作的信心。在加强指导试点工作的同时，我抓紧了文字改革的深入宣传教育工作。

对民族文字改革的重大意义，广大干部群众是拥护支持的。但是由于在新疆长期存在着宗教影响和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特别是在部分宗教、民族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中，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抵制情绪，所以，还需要对他们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教育。

为此，我们召开了各种座谈会、研究会，会议有时由“文改会”召开，有时由区党委宣传部负责召开。这时，我才发现这项工作存在着很多困难和阻力，有的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会上，有人公开攻击新文字改革方案，从根本上反对进行民族文字改革。吉拉诺夫（石油局副局长）借口宗教界有人反对，说什么新文字是从左向右写的“卡泊尔”（异教徒）文字，旧文字是从右向左横写的伊斯兰经文形式的穆斯林文字，主张不能用“卡泊尔”文字来改革穆斯林的维吾尔文字。这完全是一派蛊惑人心的宗教煽动。

又一种说法是，维吾尔文字应该以阿拉伯文字来进行改革。这种把维吾尔文和阿拉伯文混为一谈的说法，不是无知，就是节外生枝。因为两者虽然形式上有些相似，但根本是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字。

再一种说法是，坚持用斯拉夫文字来进行文字改革，说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与苏联少数民族是一种宗教、一种语言、一种习惯、一种文化，使用斯拉夫文字更方便，持这种意见的有赛甫拉也夫、扎克洛夫等人。

总之，各种说法、借口、主张、意见，归根到底就是千方百计反对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进行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方针。

我把这些问题及时汇报到自治区领导和王恩茂同志那里，他们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并指示我们：对那些坚持错误的同志，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对那些认识模糊的同志，要耐心地分析、解释，通过说服教育来提高他们的认识。

赛福鼎同志亲自出面给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做工作，对他们进行个别的谈话教育。他严肃地向阿不都拉热合曼大毛拉（二道桥大清真寺主持）指出：要认真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不能以歧视的口气把不信教的人称为“卡泊尔”，更不能说新文字是“卡泊尔文”字。这对保证文字改革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我这时还在宣传部负责毛主席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这项工作也和民族文字改革密切相关。

六十年代初，全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为了加快新疆少数民族文字《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出版工作，自治区宣传部集中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族专家干部，组成了三个审稿组，以加强工作。

由于毛主席著作中很多名词、术语，在民族文字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很难翻译表达。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理应对这些名词、术语，直接从汉语借词音译，成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中的新词汇，以丰富增强民族语言的表达能力。

但是有人却竭力反对从汉语中借词的主张。有的主张从阿拉伯语借词，说阿拉伯语的文字语言结构与维吾尔语相似；有的主张从俄语借词，说这更方便，过去就有把俄语词汇移到维吾尔语中的习惯等等。

他们无视时代的变化发展，还要一味地墨守陈规，他们不顾新中国民族大家庭中各族人民要求使用容易听懂、方便交流的新词汇的强烈愿望，这实际上又是拒绝执行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进行民族文字改革的方针。

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维吾尔语中借用的汉语词汇，例如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等词汇已达二百五十多个。各族群众早已习惯了直接从汉语中借词。

所以那种根本不顾广大群众能不能听懂、好不好接受、是不是欢迎，只是一味反对从汉语中

借词的观点，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表现，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各族人民意愿的，它只会阻碍民族文字改革的正确发展方向。

我们始终坚持中央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方针，排除各种干扰，统一认识，终于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很快完成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三种文字的《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和《毛主席语录》的翻译出版的任务。

1962年，自治区党委根据维吾尔、哈萨克文字改革试点工作的成功经验，及时作出决定：在全疆维吾尔、哈萨克等各级各类学校和全疆机关干部及广大群众中，普遍推行维吾尔、哈萨克新文字。

“文改会”顺势而上，立即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组织工作。首先，出版了大量的新文字教材和出版物，以适应广大学生和青年的学习需要。其次，举办各种新文字培训学习班，推广改革试点的成功经验。通过这些工作，全疆范围内迅速地掀起了学习新文字的热潮。

不仅维吾尔、哈萨克族的学生、干部、群众在学习新文字，甚至连其他民族的学生、干部、群众，也都在学习和掌握新文字。各级党政机关还组织干部进行学习新文字的测验考试，短短两年就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据初步统计，在维吾尔、哈萨克族学生、机关干部和社会青年中，会读、会写、会用新文字的人数达一百三十万人以上。

由此，1964年，自治区人代会通过决议，确定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维吾尔、哈萨克拉丁文字，为维吾尔、哈萨克民族的法定文字。

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种报刊，对此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导，称颂这是维吾尔、哈萨克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有利于维吾尔、哈萨克民族的发展进步，也有利于新疆以至全国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学习、沟通文化、共同发展，更有利于新疆各族人民跟上时代的步伐，学习和掌握人类先进的科学文化，促进民族的进步繁荣。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和中央广播电台，也就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重大成果、深远意义和成功经验，进行了宣传报导。

#### **4. 因循守旧，文字改革工作的成果被否定**

在成功地推行维吾尔、哈萨克新文字的大好形势下，自治区“文改会”根据各民族群众的迫切要求，起草了新疆蒙古族托忒文改革采用拉丁新文字的方案，又为克尔克孜族创制了拉丁文字方案。就在准备实施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促进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反而造成了全民族文化的大倒退。

“文革”一开始，“文改会”自然瘫痪了，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进程被迫中断，正在蓬勃发展的民族文字改革濒临夭折的边缘。维吾尔、哈萨克新文字——这个刚出生的婴儿，成了漂泊无所的弃婴，任由风吹雨打。虽然，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中还在使用新文字，但在急风暴雨过去后，强大的旧习惯势力卷土重来，竭力要扼杀这个新生的婴儿。

1982年，在自治区第四届人大常委会上，赛都拉·赛甫拉也夫竟然匆忙地决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废除维吾尔、哈萨克拉丁新文字，恢复阿拉伯字形的维吾尔、哈萨克旧文字。

至此，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巨大成果，被完全、彻底地取消和否定。新疆的民族文字改革工作夭折了，新疆民族文化进步的列车被拉上了历史的倒车。

这是历史的大倒退！这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悲剧。它使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民族的人民丧失了一次与祖国人民和世界文化接轨的绝好的机会。

赛甫拉也夫同志是否还记得，他在解放前的30年代，就致力于新疆民族文字的改革呢？他是否还记得，25年前他还领导过新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呢？他是否还记得，他曾经一贯极力坚持要用斯拉夫文字进行文字改革的主张呢？

如果他没有忘记，那么为什么现在却突然要否定文字改革、突然要倒退到赞成恢复旧文字的立场上去了呢？

难道只因为要实行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文字改革方针，就宁愿倒退到旧文字中去吗？

在全国正在兴起的改革浪潮中，新疆竟出现这种逆潮流而动的反对文字改革的怪事，岂不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几十年来，我国一直推行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拉丁字母文字改革，至今也没有改变。实践证明，改革的拉丁新文字，不仅有利于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共同发展进步，也有利于语言文字国际化方向发展，有利于适应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面向全世界的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需要，以及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现代化步伐的要求。

自从维吾尔、哈萨克新文字被强行废止以来，广大青年学生提出恢复新文字的迫切要求越来越强烈，他们为自己因为废弃了新文字而成为新一代文盲的事实感到气愤。他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旧文字已经适应不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需要，也适应不了国际、国内通讯和互联网的应用的需要。

他们说，改革开放以后，在全社会都在学外语，全世界学习汉语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在我们新疆竟会有人反对拉丁新文字，而且新疆的人大常委会竟然会这么草率地通过这么一个荒唐的决议！这到底是在坚持进步，还是在坚持倒退？是非曲直不是一清二楚吗？

新疆蒙古族文字改革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甚至走得更远。

六十年代中，新疆“文改会”遵循党的民族政策和文字改革方针，制定出新疆蒙古托忒文改为拉丁新文字的改革方案。只是由于“文革”的破坏，未能具体改革。

不料从八十年代起，却发生了逆转。自治区个别蒙古族领导干部，违反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反对按照新疆地区历史特点推行蒙古族文字改革，坚持错误地把新疆蒙古托忒文字改为内蒙古自治区的胡都木文，搞蒙古族文字的所谓“统一”。

内蒙古与新疆的蒙古族，虽然是同一个民族，但居住地域相距遥远，各自有自己特殊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文字。

按照党的民族政策，蒙古族分别在两个自治区内、实行区域自治，因而绝不能打破区域自治追求什么文字的“统一”，只能统一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实行各自的区域自治。

内蒙古自治区使用的胡都木文，是有近千年历史的老文字，而新疆蒙古族使用的托忒文，则是适应新疆蒙古族历史发展特点的需要，在老文字基础上简化出来的只有三百来年历史的近代文字。

那种强行取消新疆蒙古族由于历史发展而自然形成的托忒文字，硬要把它“统一”到内蒙的胡都木文字的所谓“统一”方针，直接违反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极端错误的。

现在阿尔泰专区居住的蒙古族，一部分叫图瓦蒙古人，居住在喀纳斯湖畔，建立了喀纳斯图瓦蒙古自治乡。另一部分叫柯克孟卡克蒙古人，杂居于阿尔泰城市附近。

我曾经作为一个地道的蒙古族人，在三区革命时期到过阿尔泰地区，竟然听不懂图瓦人和柯克孟卡克人说的话。

由于独特的历史发展，使他们形成了不同于新疆绝大多数蒙古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但他们认定自己是蒙古族，国家也承认他们是蒙古族。我国学者和外国学者，通过实地考察过图瓦人、柯克孟卡克人的发展历史，也确认他们属于蒙古族。

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把他们不同的语言、文字强行“统一”到新疆绝大多数蒙古族的语言、文字中去，而只能通过改革，在新的基础上促进民族语言文字的进一步创新。

可是现在，却有人竟然不顾广大新疆蒙古族干部、群众的正确意见，一意孤行，从1982年起，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要新疆的蒙古族学校一律使用内蒙古自治区出版的教材。

为推行胡都木文，他们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在新疆一些县市召集各种会议，有的还请内蒙古自治区的人员参加。

然而，经过二十多年的劳民伤财，至今也没有达到在新疆蒙古族中普及胡都木文的目的。

由于古老的胡都木文字复杂，难懂难学，使得广大新疆蒙古族干部群众特别是农村牧区群众，听不懂内蒙古自治区的广播电视，看不懂胡都木文字出版的报刊杂志。在校学生高中毕业还不能正确使用胡都木文。有的教师也讲不清胡都木文语法，不得不经常用托忒文来进行补充说明。这就造成了新疆蒙古文报刊、杂志的文字混乱。只好采取一半托忒文、一半胡都木文的尴尬局面，严重影响了党的宣传工作和自治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切违背客观规律的倒行逆施，必然要遭到历史的无情惩罚，活生生的现实难道还不清楚吗？

语言、文字是相互传递人的思想感情的载体。是一个民族的“徽记”。一种语言从一地 toward 另一地传播，来源于人们“交往”的需要。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和谐、有机地运行，主要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特别是内心世界、思想感情的交流。彼此相通的语言文字是各民族之间加强沟通和理解，减少偏见和隔阂，走向共同进步，实现共同繁荣的工具。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的增加，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一国人民的国民经济和文化生活，更加与其他国家息息相关，渗透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

据说，现在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中存在着六百多种语言，而文字却要少得多。据科学家们推测，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再过一两个世纪，世界上可能只会剩下为数不多的几种文字，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 56 个民族中，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据统计，现在在全世界共有 11 亿人以汉语为母语。汉语已经和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一道，成为联合国的 5 种工作语言之一。成为所有文字中信息量最大、表达能力最强、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文字。现在全世界在校正规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 500 万，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总数达到 3,500 万左右。我国在 50 多个国家（地区）建立了 125 所孔子学院或课堂；向 80 多个国家派出了国际汉语教师和志愿者教师；在 42 个国家（地区）设立了 106 个汉语水平考试（HSK）点。

汉语之所以在世界上迅速传播，还得益于它的博大精深和科学规范。汉语是世界上唯一独立发展又连续不断使用至今的象形文字，历经五千年而经久不衰，它负载着中国悠久的历史，深邃的文化，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充分显示出其自强的力量、兼容的气度和灵便的睿智。始终对世界各国散发着迷人的文化魅力。我们周边国家的日语、韩语和越语都保留有大量的汉语借词以及汉语书写体系的文字。

汉语自从上世纪 50 年代实行拉丁字母拼音的文字改革以后，经过一批专家研究，突破了计算机语言的桎梏，可以轻松地进入国际通讯、互联网和各种软件的设计和使用领域。使我们与世界各国打交道、谈生意更加方便、快捷。它使中华文化的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和谐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迅速地向世界各地辐射，使它更有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对于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共同追求人类的安宁与福祉，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迪。

新疆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从历史上就相互影响、相互借用，为各民族的文化繁荣、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直至今日，还有个别人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无视新疆大多数人民的迫切要求，排斥各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汉语名词。例如，一些少数民族干部群众都能听懂和熟练地说出“共产党”这个名词，而我们的一些民族出版物或者广播电视上，非要说成“帕尔提亚”；普通群众说的“电视”，而报纸和广播电视却说成“提尔维祖尔”，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他们宁愿舍近求远，从俄语中去借词，却不愿意从自己国家的汉语中去吸收。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离心情绪，难道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现在，南疆等少数民族群众地区建立了许多汉语学校，在教授少数民族语言的同时教授汉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欢迎。我认为这是贯彻党中央加快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正确措施。

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党的十六大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任何民族的语言文字，无例外地都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而不断地改革创新。民族文字的改革和创新，密切关系着本民族的经济、文化进步和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忠实的“三个代表”，一贯重视民族文字改革创新工作，不断推进汉字改革和少数民族文字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进入 21 世纪，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文字改革工作更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发挥其特有的功能和作用，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代列车滚滚向前，任何反对、干扰、阻碍民族文字改革的行为，都是违背民族文化发展客观规律，开历史倒车的行为。维吾尔、哈萨克拉丁新文字被废除和恢复老文字是开历史倒车，同样，把新疆蒙古族的近代文字托忒文字，改为老胡都木文字更是开历史倒车。它们只不过是开中国改革大潮中的一小股逆流。

20 世纪已经过去了，应该调转车头了。应该是开始制止倒退，让新疆民族文字改革重新走上前进轨道的时候了。

## 【网络文章】

### 俄罗斯与中亚“双向移民”：新的移民叙事正在悄然构建

澎湃新闻记者 侯丹玮，实习生 李逸珂

2024-05-01 07:41 来源：澎湃新闻

2024 年 4 月 22 日，身处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俄罗斯人伊万在自己 30 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结束了一天的线上工作，与几个朋友一起共同庆祝了自己的 36 岁生日。

这已经是伊万在比什凯克度过的第二个生日。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开始对俄实施全方位制裁。由于工作受到冲击，曾经在莫斯科拥有一家广告公司的伊万像许多俄罗斯人一样，选择离开生活了数十年的故土，在异国他乡开启自己人生的新篇章。由于人数众多，他们甚至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релокант**（注：英文常译为 **relocated person**，即被重新安置的人）”。

“制裁对我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百事可乐、可口可乐等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离开了俄罗斯市场。而在此之前，我一直在为这些品牌提供服务。”每当提到自己两年前的选择，伊万言语中总是充满了无奈。

人近中年遭逢剧变，放弃迈入正轨的事业、孤身一人背井离乡，伊万的选择，无奈中也有许多必然。随着近些年来线上办公形式的兴起，长期从事市场营销工作的伊万早已提前适应了“数字游民”的生活模式，时常在俄罗斯国内四处“流浪”。而吉尔吉斯斯坦近年来对 IT 行业的重点扶持以及针对“数字游民”的优惠措施让他最终确定，比什凯克将成为自己新生活的起点。

曾经在莫斯科见过许多中亚劳务移民的伊万，如今自己作为“数字游民”来到了中亚，心中不免有颇多感慨，也对这里产生了新的认识。回望两年的“流浪”生活，伊万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生活感到很知足。他向澎湃新闻新闻（[www.thepaper.cn](http://www.thepaper.cn)）表示，尽管中亚国家并不发达，但的确正在迎头赶上，自己在莫斯科和比什凯克的生活并无太大不同。

然而，在知足的背后，伊万也有着不轻易示人的落寞。

“我曾经富裕过，但现在我已经失去了赚钱的动力，金钱已经无法给我带来幸福。”在 36 岁生日那天，伊万一张张翻看起自己年轻时和朋友们在俄罗斯拍下的老照片。看着照片中那个意气风发、亲友相伴的年轻人，伊万感慨道，自己也曾有过一段快乐的人生。

### **“他们正在效仿迪拜，为什么不呢？”**

从 2011 年开始，伊万就在市场营销的赛道上经营着自己的事业且小有所成，在莫斯科开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广告公司，时常为国际品牌提供服务。这份工作忙碌而充实，且对于工作地点没有严格限制，一台电脑、一个稳定的网络环境是伊万工作所需的全部。也正是这样的工作经历，让伊万在 2022 年冲突爆发后很快做出了离开俄罗斯、寻找新机遇的决定。

战火之下，因签证便捷、地理位置相近、语言相通等因素，伊万像许多俄罗斯人一样，选择迁居中亚国家。中亚大学 2024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2 年，迁居中亚的俄罗斯人平均年龄为 30-32.5 岁，较俄人口平均年龄要年轻得多。与此同时，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大城市，收入高于俄平均水平，70%-80% 的人曾接受过高等教育、精通英语，通常在 IT 部门、艺术设计、科学、教育和媒体领域工作。换言之，这些离开俄罗斯的人是处于“黄金年龄”、高技能、高收入的群体。

“最聪明的、受过教育且有钱的人离开了俄罗斯，毕竟还有什么能比战争更危险呢？如果你很穷、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那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伊万说道。

对于俄罗斯而言，人才流失无疑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但对于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而言，2022 年后俄罗斯人的迁入却是一个为国家吸收高技能人才的绝佳机遇。

吉尔吉斯斯坦看到了这一契机，并很快主动推出了优惠政策。2022 年 8 月，吉尔吉斯斯坦通过《关于批准授予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数字游民”地位的临时规定》，对来自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和俄罗斯在数字技术领域开展活动的公民，开放了“数字游民”身份申请。获得“数字游民”后，外国公民能够自动获得在吉个人身份证号，可获

得长达 12 个月的工作许可，最多可延期一年，同时免于在暂住地登记，并按照司法部和税务局规定的程序开展个人创业活动或法人实体活动。

伊万正是注意到了吉尔吉斯斯坦针对“数字游民”的相关便利政策，最终据此做出了迁居比什凯克的决定。而像他这样的俄罗斯 IT 人才，也成为了相关政策的最主要受益者。根据吉劳动、社会保障与移民部提供的数据，从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11 月底，共有 1961 名外国公民获得“数字游民”身份，其中 1935 人为俄罗斯公民。

吉尔吉斯斯坦对于 IT 行业的扶持让作为从业者的伊万倍感欣喜。其中，吉高科技园区令他印象尤为深刻，其前身是吉多家 IT 公司联合成立的软件与服务开发者协会（KSSDA），自 2008 年起开始与吉交通和通信部推广建立高科技园区的想法，并最终于 2013 年底落地。

据伊万介绍，高科技园区提供了一系列优惠、简便的服务，能够免除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给从业人员带来的不便。伊万在注册法人实体时，高科技园区就帮助他节省了大概 90% 的时间。

如今，吉高科技园区通过为本土和外国科技公司及企业家提供税收优惠来支持科技产业发展，在园区注册的公司可免于缴纳增值税、利得税与销售税。截至 2024 年 2 月，共有 383 家企业、2417 名专家入驻园区。据估算，每位专家为吉经济带来了 3.6 万美元的收入。

今年 4 月 22 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高科技园区进军美国硅谷之际，吉总理阿·扎帕罗夫表示，吉尔吉斯斯坦的目标是成为 IT 行业发展的最佳场所。

“这就是迪拜的起源。他们正在效仿迪拜，为什么不呢？中亚有更多的资源。”伊万说，许多俄罗斯人正是因为吉尔吉斯斯坦的优惠政策开始在这里做生意，为吉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另据专家估算，近两年以来，俄罗斯企业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开设了 450 家分公司。

在比什凯克生活了两年后，伊万对于吉尔吉斯斯坦乃至整个中亚有了新的认识。“说实话，我在莫斯科和比什凯克的生活只有很微小的差别。尽管中亚的国家不算发达，但是他们正在迎头赶上。各国首都已经与俄罗斯的一些主要城市不相上下，甚至更好了。”不过，伊万也坦称，在中亚，人们仍然贫富差距悬殊。对于富人而言，这里相当发达，可以用钱买到一切，而为中产阶级提供的服务则不多。

### **孤独的流浪者**

得益于吉尔吉斯斯坦便利的政策，伊万很快在比什凯克安顿下来。两年来，通过自己丰富的市场营销经验，他从网上接到了不少来自独联体国家的订单。掌握多项营销技能的伊万时常戏称自己一个人就顶得上一整个“合唱团”，能够为各类客户提供所需的服务。

如今，伊万一周工作五天，平均每天需要工作 9 小时。任务量大时，一天工作 12 小时也是常事。即使是这样忙碌地工作，伊万的收入仍远不及从前。虽然他时常感慨金钱已经无法给自己带来幸福，但为了生活，他最近已经开始为获得新的兼职工作而准备面试。

“对于做市场营销的人来说，同时拥有 2-4 份工作是很正常的，更何况我的客户还不是很稳定。以后我说不定要 24/7（全天候）地工作了。”伊万说，自己已经投出了 900 份申请，但回音寥寥。从老板重新变回普通打工人，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转变。

“十二年的时间让人忘记了该如何写好一份简历。”伊万半是调侃半是无奈地说。

工作中，伊万渐渐习惯了单打独斗。工作之外的日子里，他也习惯独来独往。闲暇时，他多半会在家里读书、打电子游戏、看看电视剧，偶尔去咖啡店点上一杯咖啡、一份甜品，静静地看着比什凯克街道上的人来人往，感受时间的流逝。

伊万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孤独的流浪者。他坦言，在异国他乡寻找到真正的朋友并非一件简单的事。年轻时，他曾有众多好友，大家一起聚餐玩乐、四处闯荡，在说唱中吐露过自己的人生态度，在旅行中见识过传说中诺亚方舟最终停泊的亚拉拉特山峰。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伊万的朋友们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大家渐渐走散，孑然一身的他生活在另一个国度，结交新朋友的唯一途径变成了互联网。

“当然，我们有一些在吉俄罗斯人的 Vk（俄罗斯社交软件）社群和一些类似的东西，但网络上的关系无法投射到现实里。”伊万无奈地说，“我也交了一些当地的朋友，还建立了一些商业联系，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是这些人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在比什凯克，与伊万时常线下见面的只有一对同样在俄乌冲突后来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罗斯情侣。他们中有一人是程序员，另一人则是心理学家。三人约好每月到酒吧里一起小酌，聊聊各自的近况。

尽管忙碌和孤独已经成为伊万日常生活的底色，但谈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两年时光时，他还是非常满足。除了一些能够提供便利的政策外，伊万说，自己也钟情比什凯克的自然风光，享受这里温暖的气候。在他看来，比什凯克的民众大多热情友好，普遍都能够用俄语交流，这让他感到自己似乎已经开始融入这个在两年前还显得十分陌生的国家，甚至开始考虑改变自己的国籍。至于未来是否会回到祖国，伊万坦言，这将取决于俄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不过，即便是在异国他乡，伊万也无法完全免受战火的影响。两年来，由于受到西方金融制裁冲击，伊万的俄罗斯银行卡时常在支付或转账过程中出现问题。今年 2 月，美国针对包括俄罗斯 Mir 支付系统在内的俄罗斯核心金融基础设施进行制裁，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多个国家因担忧二级制裁而停止为 Mir 卡提供服务。尽管伊万仍有其他的银行卡可用，但他无奈地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都无法使用 Mir 卡支付了。

### 微妙的失衡

“2022 年秋天，这里来了很多俄罗斯人，引发了很多问题，最明显的就是租房的费用上涨了许多。”生活在比什凯克的艾努拉向澎湃新闻说道。在比什凯克从事服装生产的努尔别克显得更为愤怒，他称：“俄罗斯人毁了我们的经济，所有东西都变得越来越贵了。”

作为在战争初期便来到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罗斯人，伊万也感受到了住房成本的变化。他说，如今房租已有所下降，但平均来说，整体上涨幅度仍有 30%左右。目前，伊万在比什凯克较好的地段租了一套 30 平方米的公寓，每月租金约为 350 美元，而两室一厅的房子则需要每月 450 美元。而相较之下，吉公民 2023 年平均月薪仅为 372 美元。

据吉专家观察，吉住房成本上涨在 2022 年 10 月达到一个小高峰，俄罗斯人的大量涌入被认为是推高房租的原因之一。不过，也有吉房地产从业者表示，除去这一因素外，在包括俄乌冲突在内的国际紧张局势影响下，全球通胀居高不下、建材价格上涨才是吉房租上涨的最重要原因。

伊万曾纠结过是否要前往欧美国家，但综合考量生活成本及工作机会，中亚的性价比显然更高。他还曾考虑过机会更多、工资更高的哈萨克斯坦，但在他看来，那里针对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烈，而吉尔吉斯斯坦“去俄化”进程相对缓和，几乎没有“民族主义者”，人们对俄罗斯人大多比较友善，且俄语普及度仍旧很高。

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中亚五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去俄化”进程。其中，废除俄语官方语言地位、改用拉丁字母被视为“去俄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如今，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已失去官方语言地位。在塔吉克斯坦，俄语被定义为“族际交流语言”。只有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语尚且保留官方语言地位。不过，哈萨克斯坦已自 2017 年启动哈萨克文拉丁化改革，计划至 2025 年逐步完成，吉尔吉斯斯坦目前尚未开启这一进程。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由俄罗斯向中亚国家的逆向移民潮激发了对于语言、民族记忆和历史认同的争论。在哈萨克斯坦的社交平台中，曾一度出现对俄移民可能抢占本国工作机会的担忧。也有人担心俄罗斯人会不承认中亚国家在独立后所取得的成果，这使得俄罗斯人无论是称赞并惊讶于哈萨克斯坦的发达程度，又或是对当地的习俗表达不满，都可能引发当地民众的愤怒。迁居至此的俄罗斯人究竟是否必须学会哈萨克语，也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即便是在“去俄化”相对缓和的吉尔吉斯斯坦，当地人对俄罗斯人的态度仍然十分复杂。这不仅与历史因素有关，也与现实存在的问题息息相关。

吉尔吉斯斯坦数字发展部的数据显示，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共有 92988 名俄罗斯人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登记。2023 年 1-10 月，俄罗斯公民共登记 247743 人次，其中包括之前登记人员的续期。不过，由于在吉登记的俄罗斯公民还包括留学生、游客等，因此很难确定究竟有多少人是因战火而来到吉尔吉斯斯坦，又有多少人最终选择离开。

尽管对移民涌入后所引发的问题感到不满，但多名吉国受访者向澎湃新闻表示，绝大多数吉尔吉斯斯坦人仍然对俄罗斯人比较友好。只是，在今年3月莫斯科恐袭事件发生后，一种从2022年俄罗斯移民大量涌入后便已浮现的不平衡感似乎开始进一步加深。

已经定居在中国的吉尔吉斯斯坦姑娘阿丽娅向澎湃新闻表示，自己几个月前回国探亲时发现，吉尔吉斯斯坦现在有很多俄罗斯人，吉政府能够帮助其改变国籍，他们的收入在吉也能过得很好。然而，就在3月莫斯科恐袭事件发生后，她经常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在俄的中亚劳工被贴上了与恐袭相关的标签，甚至受到了歧视与排挤。

“有些人只是走在路上，就会被要求出示证件，还有俄罗斯人打电话问俄相关平台，司机和外卖员是不是中亚人，如果是的话，就会马上取消订单。这也并不是恐袭发生之后才有的现象，只是在恐袭之后更严重了。”阿丽娅说道。看到自己的同胞在俄被歧视，在吉的俄罗斯移民却过上了不错的生活，她的心中十分难过。

### 恐袭的阴影

塔吉克斯坦人、23岁的亚历山大目前在圣彼得堡的一家餐厅做厨师，这份工作他已经做了两年了。工作并不轻松，时常要工作到晚上10点甚至11点才能下班。现在，亚历山大和哥哥一家在圣彼得堡一起租房，每个月房租要3.5万卢布。他说，这个价格还算负担得起，毕竟“在俄罗斯待一年花的成本只能在欧洲待半年”。

小时候，他身边就有许多亲戚选择赴俄务工。那时，他们总是对亚历山大说“那里赚得更多”。多年后，尽管亚历山大读了大学，且获得了水力发电专业的毕业证，但由于在塔薪酬低、失业率高，他仍然做出了和亲戚们同样的选择。

长期以来，俄罗斯是中亚劳务移民的首选目的地，来自俄罗斯的劳务移民侨汇成了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许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帮助他们维持生活水平、减轻贫困。

虽然忙碌，但亚历山大对于在圣彼得堡的生活还算满意。然而，今年3月一场突如其来的血腥事件，让他和许多身在俄罗斯的塔吉克斯坦人陷入对未来的担忧之中。

当地时间3月22日晚，数名恐怖分子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近郊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市一音乐厅中观众进行扫射并多次投掷手榴弹或燃烧弹，最终造成145人死亡。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社交平台账号宣称对此次恐袭负责。

这场俄罗斯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震动整个社会。与愤怒和痛苦被同步激发的，还有困扰俄罗斯社会已久的移民问题。

根据俄官方消息，4名直接实施恐袭行动的嫌疑人均为塔吉克斯坦人。尽管俄总统普京强调恐怖分子“没有国籍”，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贾巴罗夫也称“下令发动恐怖袭击的人正是希望俄罗斯内部民族仇恨爆发”，但在俄政界和民间仍然出现了收紧移民政策的呼声。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前主席米罗诺夫甚至建议取消中亚国家人员入境免签，以“加强国家安全”。

3月29日，俄内务部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综合法案供讨论，该法案旨在加强对外国公民入境和在俄逗留的管理。据俄《消息报》报道，法案建议将外国公民一年内的临时逗留期限缩短至90天（目前为6个月），并要求外国公民入境时进行生物识别数据登记。俄内务部同时建议建立外国公民数字档案、推出证明外国公民身份的单一文件、建立对雇主及外国雇员的专门登记册，要求外国公民入境时签署“忠诚协议”，同意在违反俄法律的情况下限制其入境、逗留和居住的权利。俄内务部官员表示，该法案意在优化而非收紧移民立法。

俄罗斯对于移民可能引发安全问题的担忧或许并非毫无依据。就在今年2月，联合国刚刚发布报告称，在过去一年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机构成功针对塔吉克斯坦恐怖

组织“Jamaat Ansarullah”和其他中亚地区武装组织发起了大规模的招募活动。其中，该组织的呼罗珊分支（“IS-K”）还使用多个社交平台针对塔吉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民众进行宣传。而据美国3月初的情报，正是呼罗珊分支策划在莫斯科发起恐怖袭击。

然而，对于俄罗斯而言，完全拒绝中亚劳务移民并不现实。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由于老龄化、军事动员、人口外流等问题，2023年俄罗斯的劳动力缺口已达到近480万人。俄联邦政府下属财经大学副校长萨福诺夫警告称，一旦失去中亚移民劳动力，俄工业、住房、公共服务部门、交通等领域均将面临用工荒，通货膨胀将随之而来，对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尽管如此，据俄独立媒体报道，自恐袭发生以来，俄部分地区开始限制移民参与出租车、贸易等特定行业工作。已有俄经济及社会学家表示，完善移民监管流程、加速建立健全移民信息库、帮助移民适应和融入俄社会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最佳途径，而盲目的限制性措施只会加剧俄社会的排外情绪。

### 变化的天平

恐袭发生后，关于针对中亚劳务移民种族歧视的新闻在俄社交平台广为流传。塔吉克斯坦劳工部长诺迪里更是公开表示，在俄塔吉克人正在经历恐慌，许多人正准备离开，返回塔吉克斯坦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前往俄罗斯的人数。4月27日晚，塔吉克斯坦外交部敦促其公民不要前往俄罗斯。在此之前，塔外交部曾报告称，在过去几周内，塔吉克斯坦公民被大规模拒绝进入俄罗斯。根据塔外交部提供的数据，截至27日，共有954名塔吉克斯坦公民滞留俄罗斯首都伏努科沃国际机场的临时停留区。

瓦伦蒂娜·丘皮克是一名长为在俄外国移民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律师。她向澎湃新闻表示，从莫斯科恐袭发生当晚起，她的团队就开始收到大量来自移民的求助电话，其中许多人遭到了非法拘留。3月23-31日，丘皮克共收到6424份求助申请，其中附有近2万名被非法拘留者的护照数据，求助原因包括遭到勒索、非法驱逐以及控诉警察暴力致伤、伪造证据等。从数量上来看，在恐袭后向丘皮克团队申请法律援助的在俄移民中，乌兹别克斯坦人最多，其次是吉尔吉斯斯坦人和塔吉克斯坦人。进入4月后，移民求助申请的数量逐渐降低至正常水平。

亚历山大则表示，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新闻中描写的种族歧视，但确实有许多塔吉克斯坦人离开了俄罗斯，他们中有些是被驱逐出境的，还有人遭到了罚款。他还补充说，自己不希望过多讨论恐袭事件，因为警察会检查中亚人的手机，查看是否有政治相关的内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已经逐渐减少。

有分析认为，尽管当前移民的“回流”将是暂时情况，短期内也没有国家能够代替俄罗斯在中亚劳务移民中的重要性，但“重新定向”的新趋势正在悄然出现。

据丘皮克介绍，自俄乌冲突至今，许多移民已经开始计划前往其他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欧盟国家、美国（通过墨西哥）、韩国、以色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一旦俄罗斯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这一趋势可能进一步加剧。

即便是对在俄生活相对满意的亚历山大也向澎湃新闻表示，为了更好的机会、更高的收入，他现在已经计划离开俄罗斯，前往欧洲工作。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中亚在俄劳务移民数量就曾大幅减少。尽管疫情后情况有所好转，但在俄乌冲突、对俄制裁以及卢布贬值等因素的影响下，俄罗斯对于劳动力的吸引力正在下降。根据俄罗斯内务部数据，2023年上半年，独联体国家公民以“工作”为特定入境目的，在俄罗斯登记的人数同比减少了40%。

俄移民问题专家伊瓦赫纽克2023年11月曾撰文称，受俄近年来政治、经济形势影响，中亚国家意识到了自身脆弱性，一方面开始注重经济结构改革、减少劳动力外流，另一方面也在加速形成劳务移民的“替代渠道”，降低对俄依赖。

最近几年，乌兹别克斯坦已与韩国、沙特、英国、以色列签订了劳务移民协议，吉尔吉斯斯坦开始派遣公民到韩国、土耳其、德国、英国和波斯湾地区国家工作，塔吉克斯坦公民也在国家的支持下开发新的移民目的地。

与此同时，中亚国家寻求“多样化”的努力也得到了外部支持。欧盟此前在其中亚战略中，将移民问题完全与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而 2019 年的新战略则强调需要“加强移民合作”。在“脱欧”后面临劳动力短缺的英国，中亚已经取代中欧，成为当地季节性农场的重要劳动力来源。根据 BBC 的报道，直到 2019 年，英国季节性农场的市场一直由来自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的工人主导。而现在，超过四分之一的工人来自中亚。2022 年，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季节工人签证持有者占 13%（4300 人），乌兹别克斯坦占 12%（4200 人），塔吉克斯坦占 11%（3900 人）。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之下，俄罗斯与中亚之间曾经近乎“一边倒”的依赖状态似乎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乌马罗夫分析认为，战争期间，如果没有中亚的劳动力移民，俄罗斯经济将无法稳定发展。数据显示，俄罗斯每年需要约 30 万的移民涌入，方能保持人口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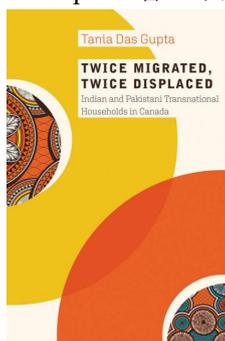
“俄乌冲突的爆发引发和加强了俄罗斯本身对中亚国家的一种奇特的依赖。可以说，我们在谈论中亚对俄罗斯的依赖时所讨论的一切，现在都可以颠倒过来。”乌马罗夫说道。

责任编辑：李晓萌，图片编辑：朱伟辉

##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 52 期

### 《两次移民，两次流离失所：加拿大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跨国家庭》

塔尼亚·达斯·古普塔（Tania Das Gupta）著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书籍简介：**《两次移民，两次流离失所》探讨了从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波斯湾国家抵达加拿大的海湾南亚人的生活。作者揭示了这一群体的多种移民模式，以及他们在移民过程中和抵达加拿大时遭遇的阶级、性别、种族和宗教歧视。

此外书中还对 9.11 事件之后的阶级流动、跨家庭的形成和身份认同等问题进行分析，展示了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和跨国主义对加拿大社区建设、侨民、公民身份和归属感的影响。

**作者简介：**塔尼亚·达斯·古普塔（Tania Das Gupta）是约克大学性别、性和妇女研究学院教授，她的研究领域包括：南亚侨民；种族和种族主义；反种族主义；移民和难民问题；国家政策；女性、工作和家庭。

**书籍介绍：**在《两次移民，两次流离失所》一书中，达斯·古普塔研究了南亚移民者的经历，他们先去到海湾国家，后来又移民到加拿大（更具体来说是加拿大多伦多地区）。

现有关于跨国主义的学术文献大多关注从母国直接迁移到目的地国家的移民及其经历，但是古普塔追溯了经历两次移民的人们，并在书中揭示了他们迁移的曲折：他们先是从印度或巴基斯坦迁移到海湾国家，后来又从海湾国家迁移到加拿大，同时，出于工作和家庭原因，这些移民还要经常从加拿大往返于迪拜、阿布扎比、印度或巴基斯坦等国。在一系列访谈的基础上，古普塔还探究了特定的种族、性别和社会阶层如何影响移民对自己身份的认知。

第一章呈现了研究的理论框架，包括“全球移民的政治经济学”和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理论。这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两次迁移的海湾印度移民和海湾巴基斯坦移民，他们可以被视为“殖民地移民”（colonial immigrants），因为虽然加拿大没有对这些国家进行殖民统治，但这些移民在加拿大仍被种族化，就像他们作为帝国的殖民地和种族臣民（as colonial and racial subjects）移民到英国一样。作者还表明，生产全球化产生了劳动分工，这样的劳动分工将女性限制在如照护者、护士、家务劳动者等一系列传统工作上。

第二章阐述了这些移民在海湾国家的经历。作者表示，在这里的停留通常被移民计划为移居加拿大的第一步，在此期间他们会逐渐积累自己的经济资本。在这一方面，有些访谈者强调了他们在选择目的地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犹豫不决。需要指出的是，寻求更优越的物质生活并不是他们决定移居加拿大的原因，因为如果考虑到这些移民先前在海湾国家享有的高收入（和免税），迁移到加拿大反而意味物质生活水平的下降。事实上，教育资源和相对容易获得公民身份（与海湾国家现有的卡法拉制度（kafala system）相比）是他们选择在加拿大定居的主要因素。

第三章重点介绍了移民在加拿大的经历。它涉及一系列不同的主题，如语言学习、教育、工作场所的歧视，以及核心家庭成员（通常是父亲）仍居住在海湾国家所带来的限制。移民的叙述使作者能够联系起移民在南亚国家、海湾国家和加拿大这三个地方的生活轨迹。事实上，该书的这一部分表明，在家庭内部出于经济考虑存在一定的性别分工，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男性往往在加拿大待了一段时间后便重返海湾国家，而母亲则留在孩子身边承担教育责任。

第四章主要聚焦于跨国移民的归属感。研究发现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对原籍文化（印度或巴基斯坦）的认同感很强，他们还会通过参与文化和宗教活动的方式保持自己的文化认同。除此之外，古普塔表明，移民与加拿大社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受访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地位和他们过去受到歧视的经历影响，且能否成功融入劳动力市场似乎是移民解释他们对加拿大正面或负面影响的决定性因素。尽管有些人会对现状不满，但已经为人父母的移民往往会通过强调儿童未来良好的职业前景来为他们移民加拿大的选择进行合理化的辩护。

第五章总结了这本书前几部分的要点，并讨论了它们对学术研究更广泛的影响。通过回顾埃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等学者有关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neo liberal capitalism）和“殖民种族主义”（colonial racism）的理论文献，古普塔细致地剖析了移民利用其中介机构的方式，并提出了解决他们在移民过程中遇到的劳动力市场歧视和被种族化等问题的策略。

总体来讲，《两次移民，两次流离失所》对跨民族主义的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古普塔特别揭示了一系列（与身份、性别、职业和文化有关的）差异性因素如何塑造了移民在海湾国家和加拿大的亲身经历。此外，有两个次要的话题可能值得进一步研究。首先，作者进行的访谈似乎跨越了10年的时间。如果进一步探讨受访者在这此期间对于加拿大看法的变化，特别是国内政治事件是否影响移民对东道国社会的看法，那将是很有启发性的。其次，如果这本书确实详细论述了加拿大的伊斯兰恐惧，读者仍然对受访的四名基督徒在海湾国家的经历和他们可能遇到的歧视感到好奇，因为现有的学术研究通常强调基督徒仍在这一地区受到特别歧视。事实仍然是，这部作品的丰富性和综合性构成了对移民研究感兴趣的人的基本读物。

#### 本文采编整理自：

Tania Das Gupta. 2022. *Twice Migrated, Twice Displaced: Indian and Pakistani Transnational Households in Canad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Paul May. 2022. Twice migrated, twice displaced, Indian and Pakistani transnational households in Canada: by Tania Das Gupt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46(13): 2960-29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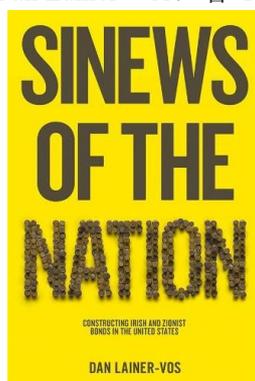
#### 延伸阅读：

- Tania Das Gupta. 2009. *Real Nurses and Others: Racism in Nursing*.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真正的护士和他者：护理中的种族主义
- Harald Bauder. 2019. *Putting Family First: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Canad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家庭至上：加拿大的移民和融合
- Glenda Tibe Bonifacio. 2014. *Pinay on the Prairies: Filipino Women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草原上的皮奈：菲律宾妇女和跨国身份  
(编译：谢小雨，责编：吕想，排版：胡琼)

##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 53 期

### 《民族“金”脉：用债券在美国建构爱尔兰和犹太复国主义纽带》

丹·莱纳-沃斯 (Dan Lainer-Vos) 著 Polity Press, 2013 年



**书籍简介：**本期选取《民族“金”脉：用债券在美国建构爱尔兰和犹太复国主义纽带》一书，作者丹·莱纳-沃斯探讨了 19 世纪至 20 世纪爱尔兰和犹太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两个民族如何通过债券的买卖在美国动员离散的民族成员进行援助，在协商中维持祖国-离散社区关系。

当我们考察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时，筹款也许不是一个寻常的视角。但在《民族“金”脉》一书中，莱纳-沃斯原创性地揭示了筹款机制——从复杂的跨国赠礼体系到微妙的国家债券——如何能够被用来团结分散在外的本民族群体。《民族“金”脉》关注二十世纪上半叶爱尔兰共和派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探究他们作为行动的组织如何在美国进行动员并获得经济支持，以用于民族建设。通过比较二者在祖国和离散社区关系（homeland-diaspora relations）上的不同历史轨迹，本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民族运动如何通过经济交易将同一族群的不同群体纳入民族国家建设工程。

传统观点可能会认为，民族国家建设就是消解内部差异，将不同群体融合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莱纳·沃斯将重点放在筹款行为上，从而挑战了这种观点。他指出，民族国家建设也是维系关系的过程，一边维持着不同群体的差异性，一边让他们为该事业做出贡献。因此，民族国家建设不仅在于制造团结象征，也在于创造独特的机制，以使异质群体存在差异的同时依然与本民族紧密相连。

**作者简介：**丹·莱纳-沃斯 (Dan Lainer-Vos) 是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系的助理教授，于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兴趣集中于（犹太和爱尔兰）民族主义、离散族群政治 (Diaspora Politics) 和经济社会学。他的早期研究关注公民身份与社会运动策略间的关系，比较了美国、法国和以色列拒服兵役运动中行动者采取的不同策略。他目前正在写作一本关于以色列游说团体在以色列建立和发展的书。

**书籍介绍：**在有关民族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过程的研究中，货币交易也许不是一个寻常的研究对象。然而，丹·莱纳-沃斯在他关于民族国家建构的杰出著作《民族“金”脉》中有力地说明了跨国筹款（从礼物赠送到国家债券）是研究民族国家建设过程的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金钱往往是带有价值色彩的政治资源。

本书的研究内容是爱尔兰和以色列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通过“爱尔兰胜利基金”（Irish Victory Fund, 简称 IVF, 1910 年至 1920 年代）和“美国犹太联合协会”（United Jewish Appeal, 简称 UJA, 1940 年代至 1950 年代）动员海外的本民族成员。它们的目标都在于诉诸民族情感以用于民族国家建设。在前一个案例中，美国爱尔兰人筹集资金以帮助爱尔兰人在争取独立于英国的民族运动中取得胜利，这在 1916 年“复活节起义”（the Easter Rising）和 1920 年代初期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二个案例中，美国犹太人筹集资金帮助遭遇纳粹迫害和大屠杀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新生的以色列定居。

对此，作者主要分析以下两个方面：（1）民族企业家（national entrepreneurs）在动员海外民族群体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2）为使民族的不同群体在民族国家建构中达成合作而建立的机制。他认为，“爱尔兰胜利基金”和“美国犹太联合协会”两个案例不仅极具可比性，且二者的比较能够帮助回答许多重要问题，包括双方共同采取的不同类型的筹款机制，以及对民族成员身份带来的权利和义务的争论。此外，这两个组织都面临着如何“将不同民族群体的成员编织进一个强大的跨国网络，以向各自的家乡提供资源”的挑战。

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对本民族的经济支持是获得民族身份的重要方式。居住在美国的爱尔兰人和犹太人通过做出经济贡献而参与到各自民族国家的建构中，使自己成为远在家乡的民族社区中的一员。然而该过程却不一定顺利。作者认为，给予（giving）的本质有可能导致美国的给予者和民族家乡社区之间产生紧张关系；而用发行债券的方式代替直接赠与，能够让双方都保持他们对这种关系的合适定义。很显然，在债券这种资助形式中，远在美国的民族成员出于帮助本民族人民的心愿而购买债券；他们本可以选择其他更好的投资渠道，但将资助定义为“投资”（而非直接赠与）能让资助对象保持（表面上的）独立尊严。即使双方对债券这种援助方式具有不同的定义，正是这种方式让达成合作成为可能。

然而，两个民族国家建构工程的结果却不同。爱尔兰债券项目最终走向了失败，并进一步划分了爱尔兰人和美国爱尔兰人间的界限；以色列债券项目则取得了成功，为侨居成员提供了参与犹太民族国家建设项目的有效渠道。那么，爱尔兰和以色列的债券项目如何走向了不同的结果？作者认为，爱尔兰之所以在试图稳定与美国爱尔兰人的关系中失败，是因为在 1920 年代，本土和美国的爱尔兰精英间存在高度个人化的斗争、腐败指控和组织间的竞争。这些冲突波及了离散民族的其他活动领域，导致美国爱尔兰人主要组织的系统性崩溃。因此，美国的爱尔兰人最终并没有积极地参与到支持爱尔兰独立战争的筹款项目中（尽管在 1879 年至 1882 年期间，他们筹集并资助了超过五百万美元用于支持爱尔兰土地战争（the Irish Land War）。）而对犹太人来说，“美国犹太联合协会”缓解了祖国与海外民族社区关系中的矛盾，动员后者对以色列进行经济投资和情感投资，成功为祖国与侨民间关系的建立提供一个新的渠道。

《民族“金”脉》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莱纳-沃斯对经济社会学做出的理论贡献具有普遍性，扩展了关于礼物作为物质交换的特殊形式的学术讨论。经济社会学家们已经发现，纯粹的经济推理在解释工作、消费、投资和生产的决策时具有局限性。许多研究表明，对决策行为的解释往往存在二元论的错误倾向，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决策要么是理性计算和战略选择的结果，要么是情感、社会和文化决定的结果。而许多种经济行为实际上是这两种动机结合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莱纳-沃斯对一个前人从未研究过的案例进行了分析。他识别了一种既是投资又是礼物的特殊存在——用于为民族国家建设筹款的债券。这一观察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紧密相关（作者特别提到了爱乐乐团（philharmonic orchestra）的案例），筹款者可

以混合使用多种机制将支持者转化为——不论是实际上的还是象征性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而不仅仅是捐赠者，从而巩固他们的投入。

同时，通过将分析置于人类互动和知识的普遍理论（包括加芬克尔、布迪厄和拉图尔的理论）中，作者将美国爱尔兰人和犹太人的民族情感制造过程视为更普遍的社会世界中意义生成和再生产的过程。例如，作者对自私和无私行为根本的模糊性进行了讨论。捐赠一般而言被视为不求回报的利他行为，但在本书中，那些为民族国家建设提供经济援助的海外民族成员期待得到认可和感激。这是一个被研究礼物机制的学者所熟知的悖论。当债券以实现集体利益为目的时，除了通过投资制造收益的债券售卖者，购买者也会被感激，这将为礼物研究提供新的启发。莱纳-沃斯很好地展示了在不同的情境下，个体的不同行为动机如何共同作用、发生变化或得到维持：“成功的民族国家建设动员并不意味着用单一的民族情感代替特殊主义的自利考虑，而是在持续的协商、妥协和承认中协调个体和所属民族的利益”。

《民族“金”脉》是一本优秀的著作，使用比较方法突出了经济交易在民族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其主要贡献在于关注民族国家建构、致力于研究组织和动员的能动过程，将货币交易和筹款游说视为培养和促进与民族和社群的情感连接的重要过程。本书也展示了比较方法的优点，不仅通过两个案例的相似性揭示了相似的结构力量，也通过差异性识别了导致不同结果的关键变量。

#### 本文采编整理自：

Elgenius, G. 2014. Review of the book *Sinews of the Nation: Constructing Irish and Zionist Bo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Dan Lainer-V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0(1), 303-306.

Rothera, E.C. 2015. Review of the book *Sinews of the Nation: Constructing Irish and Zionist Bo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Dan Lainer-Vos. *Human Rights Review*, 16, 79-80.

Yonay, Y. 2016. Review of the book *Sinews of the nation: constructing Irish and Zionist Bo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Dan Lainer-Vo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3(4), 507-510.

#### 延伸阅读：

Lainer-Vos, D. 2010. “Diaspora-homeland relations as a framework to examine nation-building processes.” *Sociology Compass* 4(10): 894-908. 离散社区-祖国关系作为民族国家建立过程的研究框架

Lainer-Vos, D. 2012. “Manufacturing national attachments: gift-giving, market exchan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rish and Zionist diaspora bonds.” *Theory and Society*, 41(1): 73-106. 制造民族情感：礼物赠与、市场交换，以及爱尔兰和犹太债券的建构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常人方法学研究

Feldestein, A. 2007. *Ben-Gurion, Zionism and American Jewry: 1948-1963*, New York: Routledge. 本-古里安，犹太复国主义与美国犹太人：1948-1963

Cohen, N.W. 2003. *The Americanization of Zionism, 1897-1948*. Lebanon: UPNE. 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化

（编译：李笠箫，责编：吕想，排版：胡琼）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